

SUPPLEMENTS
TO
COL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

毛泽东集
补卷

7

1941·2—1945·4

監修—竹内実
編集—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

蒼蒼社

《毛泽东集补卷》例言

一、《毛泽东集补卷》是为了增补业已出版的《毛泽东集》而出版的。编辑方针和《毛泽东集》相同：

1 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收集和收录作者从年青时代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前的著作；

2 按照执笔、讲演的日期排列，没有注明执笔等日期的，便采用它的发表日期。

一、著作的收录范围：

1 有作者本人签名的，无论只是作者单独签名或者与其他人一起签名，都要收录；

2 虽然没有签名，但有根据可以肯定的，也都要收录；

3 因而除了论文、报告、讲演、书信以外，还包括谈话、宣言、法令、电报等。

一、但不收录资料性较低的，或太零星片段的，如：

1 诗词、题字、语录等；

2 只能从刊物、学者论文引用里见到，而不是它的全文的；

3 只在已出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里有全文的；

4 业已另有本子很容易入手的。

一、著作中如有几种版本，我们优先采用出版或抄写日期最早的版本。利用学术性著作、资料集等中所收录的版本
的，基本上还是同样。

一、采用的版本如有错字或模糊难读的字，根据其它版本加以更正、补充。

一、采用简化字。

一、对每篇著作注明它的来源如下：

1 原载刊物名、出版社名和它的出版年月日；

2 如原载刊物多种，用○表示把它做了本文，用☆表示把它做了参考，用△表示在出版前没能见到。

一、原文中很难判读的文字，用□代替；推定或更正的，在字傍加了]；很明显是错字，但没有其它版本难以更正的，在字傍付マ▽。

一、原文里的『』”“等，一律都用「」。

一、在每篇表题之第二行，注明它的执笔（或发表）日期；原文没有记明的，也尽量注明。

一、表题傍边加*的，是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面收录。

一、〔 〕内的说明是编者写的。

一、本卷注明：本卷的本文跟《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之间的文字上的差异，用傍注、头注、补注来表明。对照时，我们用一九五—一六〇北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以下略称《选集》）和一九六四年北京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以下略称《选读》）。

傍注的

1 2 3 ……表示头注号码。

例：（本文）要彻底战胜日本²¹ （头注）21彻底↓彻底的 22日本↓日寇

它表示，在《选集》《选读》上是：要彻底的战胜日寇。

× 表示这文字、符号，在《选集》《选读》上被删去。

例：进到彻底与真诚合作的程度↓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

() 内的记号，如：(。)(，)等，表示《选集》《选读》上被使用。

例：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

本文傍的小字，如：和、它、他等，也表示上面的关系。

例：完全的、诚意的↓完全地、诚意地

∧ ∨ 内的记号：如 ∧。∨。∧，∨ 等，表示《选集》《选读》上新增加、插入。

例：否则因循坐误↓否则，因循坐误

↓ 表示《选集》《选读》取消改行。

〔改〕表示《选集》《选读》上从那个字起改行。

用上面这些记号难于处理的时候，我们在本文傍边用补1、补2……表示每篇著作后面有补注。

一、另外，我们跟《选集》《选读》以外的版本也进行过对照。在这个场合，两者之间的不同，也用上面的方法来注明。「鲁迅论」（第五卷）就是这样处理的。并且，在头注前面写出所对照的版本，《文献↓毛泽东思想万岁》那样。

目次

例言

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一九四一·二·七)	一三
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一九四一·二·七)	一五
*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于延安	一九
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一九四一·二·二四)	二三
毛泽东等七参政员致参政会秘书处删电(一九四一·二·二五)	二七
询问周恩来、董必武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问题(一九四一·二·二〇)	二九
关于蒋介石反共情况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一九四一·二·二六)	三一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一九四一·二·二八)	三三
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问题致周恩来(一九四一·三·二)	三五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二九四一·三·四)	三七
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二九四一·三·二二)	三九
致司徒美堂先生等复电(二九四一·三·一四)	四一
关于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致周恩来(二九四一·三·一五)	四三
关于国际关系与国共关系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二九四一·三·二七)	四五
关于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问题致周恩来(二九四一·三·二二)	四七
电福斯特同志祝寿(二九四一·四)	四九
关于国共继续团结抗日问题致周恩来(二九四一·四·二六)	五一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五三
接见绥米学生代表时的谈话(二九四一·八)	五七
电唁张冲先生家属(二九四一·八·一三)	五九
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二九四一·九·二六)	六一
为王观澜同志的题词(二九四一·二·一六)	六三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九四一)·····	六五
「文化课本」序(一九四二·一·二七)·····	六六
关于全边区部队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指示(一九四二·一·二三)·····	六九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七一
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慰问信(一九四二·三·四)·····	七七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三·三〇)·····	八一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一九四二·三)·····	九一
给李鼎铭的一封信(一九四二·四·二九)·····	九七
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电报(一九四二·八·四)·····	九九
庆贺英工人日报复刊电(一九四二·八·三)·····	一〇一
对刘少奇「论党内斗争」的按语(一九四二·一〇·九)·····	一〇三
给中共北方局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一九四二·一·二七)·····	一〇五
官僚主义者的画像(年月日不详)·····	一〇七

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一九四三·一·二五)·····	一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一九四三·二·二六)·····	二二
为志丹陵题词(一九四三·五·六)·····	二七
视察南泥湾时的讲话(一九四三·七)·····	一九
给冀察晋分局的电报(一九四三·八·五)·····	二二
给彭德怀的电报(一九四三·八·二)·····	二三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一九四三·八·二五)·····	二五
给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一九四三·八·一六)·····	二三
接见外地来延安的工作干部时的讲话(一九四三)·····	二五
对延安市民众代表的讲话(一九四四·二·七)·····	二七
柳树和松树——对随军南下干部的讲话——(一九四四)·····	二九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一九四四年留守兵团政治部

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一九四四·四)……………二四二

在职工代表等招待会上的讲话(一九四四·五·三)……………一七九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四·五·二四)……………一八一

延安大学教育方针(一九四四·五·二四)……………一八三

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四·六·五)……………一八五

准备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

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讨论的各项问题(一九四四·六·二四)……………一九五

* 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一九四四·九·五)……………一九九

电贺罗斯福当选连任(一九四四·二·一〇)……………二〇五

同包瑞德的会谈(一九四四·三·八)……………二〇七

关于劳动英雄的讲话(一九四五·一)……………二一七

时局及其他问题——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在党校演讲——……………二一九

苏联红军纪念日致斯大林元帅贺电(一九四五·二·二三)·····	二四九
电唁A·托尔斯泰之丧(二九四五·三·六)·····	二五一
致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复电(一九四五·三·三一)·····	二五三
哀悼罗斯福总统之丧唁电杜鲁门总统(一九四五·四·二三)·····	二五五
「七大」工作方针(二九四五·四·二)·····	二五七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五·四)·····	二七一

毛泽东集补卷

第七卷

关于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一九四一·二·七

（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

（二）汤集团军损失不小，三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四日失陷。李仙洲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亳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现与后方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这对桂系是一大打击，估计莫德宏部将来亦有向西撤退可能。范汉杰军已从中条山南调，如洛阳危急，他军亦非渡河不可，原定庞炳勋出冀南隔断我冀鲁交通的部署，当然要放弃。胡部李铁军军已星夜东调，第八师从正宁撤至邠州，大概是准备东调的，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河南战况发展，有再调一部可能。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

（三）蒋介石原知一、二、三月内敌人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我在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大到很大，日本会坐山观虎斗吧？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中国就太平了。岂知日本人的想

法是另一样：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倒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了。三十日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四）在外边宣传时请将佳电中「肺腑之言」那一段（从「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蜂起之时」起至「深愿为两公一吐者」止，共百〇二个字）着重指出，使国民党及中间派想一想目前发生在国共间、中日间的危险状况，我们实不幸而言中。他们一定要「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所以造成了「我为鹬蚌，故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的结果。

（五）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此种估计是否适当？你的意见如何？

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

一九四一·二·七

自蒋介石、何应钦等一月十三日歼灭新四军皖南部数千人及重庆国民政府军委员会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审判叶挺的反革命命令后，影响中国政局变化极大，特综合各方情况如下：

（一）重庆国民党中央方面：极力动员反共舆论，强迫全国报纸登载污害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向中外宣传这只是军纪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谈话，同样企图用执行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意义，麻痹中外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大批逮捕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实行阴谋陷害，制造自首运动，监视与扣留各办事处人员；在军事上集中汤恩伯、李品仙二十万大军进攻华中新四军，并密令把华中八路军当作新四军来打，在陕甘宁边区附近加紧建筑封锁线并举行局部进攻。他们这些做法都是想用压力把我们一下压服下来。但国民党内部分意见分歧，何应钦、白崇禧主张痛快的干一下，何白曾用电报征求前方将领对共产党问题的态度，陈诚电复主张全面进攻，传何白电令傅作义布置进攻八路军的军事，何健、陈济棠主张杀叶挺，冯玉祥大骂何应钦，说何是阴谋，但未及蒋，孙科表示忧虑，于右任愤慨说何骗了他，张冲（国民党中委与我们办

交涉者）表示没办法，没有脸见人。国民党员有担心破裂者，老党员甚至说出这样做恐至自取灭亡，国民党人员亦多忧虑愤慨，表示此事做得过火，亦有表示恐慌者。

（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要求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孙夫人、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中委及名人联名致蒋书，指出何应钦亲日派阴谋，深望蒋勿为奸小所惑，悬崖勒马，贯彻总理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许多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如黄炎培等，一方面对被难新四军表示同情，一方面对抗战前途表示失望；黄炎培拟见蒋陈述三点：（甲）望蒋适可而止；（乙）军纪固重要，但亦须注意收集民心；（丙）请蒋把眼光向外。他向人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中间势力中有希望中共表示强硬态度者，亦有表示悲观动摇者。杂牌军及地方实力派中多数感到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他们说：「以杂牌消灭杂牌，中央则不许杂牌存在。」因而表现恐慌与对我同情。

（三）金融界自事变发生后，各种物价更形高涨，外汇跌落，各银行无行市，汇丰银行停止挂牌，陈光甫等银行家停止向内地投资。

（四）广大民众及进步势力表示对国民党愤恨，对共产党同情，认为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中国内战就要亡国，许多青年学生、工人、职员看到这个消息时，有流泪的，有苦闷的，有愤怒的，有许多学校进步分子逃走。

(五) 中共方面的整个立场见于一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与谈话，其中包括十二条要求，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党外人士例如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参政员张一麋等看了，异常高兴，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蒋、何、白原估计我们可以吓下来，以为苏联不要破裂，中共一定也不敢强硬，今见如此，出于他们意外，表示着慌，蒋几次派他的代表张冲、张治中与周恩来商妥协办法，并派叶剑英返延。

(六) 英美方面，除少数（如美大使及其海军武官及秘书三人均听何的话，说新四军抗日不是真的）及有些反动记者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局部问题，同英美无关外，大多数外人认为此事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与英美利益，他们发表文电，要求英美当局给中国当局以压力，不使事变扩大，某美记者在香港发出之消息谓：新四军并非违抗命令，在重庆与各要人谈话，深感中国形势之严重，希英美注意，中共军队全部开河北之后，国民党军队定会与日军划缓冲区，如此日军易于南进，望英美注意。重庆某外人称，外人连教会老太婆在内都愤慨说，无论理由如何，新四军是抗战的。香港英文「南华日报」社论指出：

甲、新四军之撤退区域闻已被汪精卫军队所占领。

乙、中共的力量已经被公认为整个中国抗战力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丙、不管从那一方面来观察，中共对于中国的基本要求与希望及其远见，要比保有封建的民族领袖强得多。

丁、国民党还是要整顿自己内部的纪律才行。

英大使曾见蒋劝告停止国内冲突，闻英美方面对国民党表示说，共党虽反对资本主义，但中国为了大局，中央（国民党）处理问题，勿操之过急，以免迫成事变。美国居利来华，闻与考查新四军问题有关，美借款事及中印通航事闻均因新四军事件发生障碍。德国通讯社通讯说：新四军是抗日最好部队，当他们遵令移动时为大军袭击，恐与英美有关，目前中国内部矛盾尖锐，前途恐有蒋汪合作，他估计美德如战，日本必退盟，届时日美联合牺牲中国。韩国人闻叶挺被俘甚不平，说中国一内战，韩国人解放希望就完了。

（七）日寇方面，表示兴高彩烈。南京开庆祝大会，汪精卫演说，谓蒋介石近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很不错。日本乘着重庆方面集中力量反共，特别是一月十七日命令发表后，十八日便开始调动七个师团，二十四日便大举向河南进攻，现国军仓促应战，许多将领感觉到上了亲日派何应钦的大当。

（八）综合各方面情况，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编者注：「本文无发文单位，原件经过毛泽东、任弼时亲笔修改」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子延安——

兹颁布八路军军新四军之军政委员会的条例望各级遵照执行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军政委员会条例

- (一) 游击战争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求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中指挥。
- (二) 为此目的，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委员会，以资区别），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
- (三) 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主任、参谋长等重要负责人组成之。人数不超过五人至七人，由每级提出名单，经上级决定之。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的由政委担任。
- (四) 军政委员会为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检讨工作的计划机关。凡关系

本部的军、政、党、后勤等一切工作，均可讨论决定。但军政委员会并非执行机关，其决定应交各部门执行之。例如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应交司令部执行，关于政治工作的决定，应交政治部执行等。军政委员会，只应讨论比较重大问题，把一切琐碎小问题提交军政委员会□□，是错误的。

(五) 军政委员会，应批准干部之升任与调动，但关于党员的处分与入党批准等等事宜，仍由党务委员会决定。

(六) 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用军政委员会名义下达，而应根据决定之性质，分别由司令机关、政治机关用命令下达之。下级对上级报告，也不用军政委员会名义，由各部门分别的向上级报告。

(七) 军政委员会在讨论问题时，如遇争论不能解决，应呈报上级决定之。关于紧急问题，司令员与政委仍有独断专行之权，但应将各种不同意见报告上级。

(八) 各级军政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至多两次，不得无故不召集开会。

(九) 应向干部解说军政委员会之设立，是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以收集体领导团结干部之效能。但军队仍是集中的组织，上级司令员政委及各部之命令，下级应绝对执行，下级军政委员会无权讨论拒绝命令之执行，即同级各部门亦应执行首长之命令，因为一切均应经过军政委员会的虚伪的民主情绪是错误的、应当防止与纠正。军政委员会之设立，并不削弱个人负责制。

(十) 本条例解说及修改之权，属于中央军委。

(十一) 本条例经中央书记处批准。

○新中华报 一九四一·二二·一三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

一九四一·二·一四

各次报告均悉。

(一) 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

(二) 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敌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 敌必向蒋进攻，□□□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 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 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 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 目前国共是僵局(如陈布雷所说)，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 那时蒋表示对我缓和，我亦可以稍示和缓，但目前尚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于蒋不利。

(九) 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 如蒋再令汤集团进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 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 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 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 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 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

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问□□□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毛泽东等七参政员致参政会秘书处删电

一九四一·二·一五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公鉴：

关于政府对新四军之处置，我党中央曾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一）制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五）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教，（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等项，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特此达知，敬希鉴察！

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

即删印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询问周恩来、董必武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问题

一九四一·二·二〇

- (一) 关于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是否已经办了，如已办了，请将文件告知，以便公开发表。
- (二) 关于委任新四军七个师长的命令，收到后请在重庆散布。
- (三) 拟用剑英名义复张冲一电，是否有此必要。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关于蒋介石反共情况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一九四一·二·二六

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及办事处逞凶外，他处绝没办法，苏北方面韩德勤完了，王懋功、冷欣等决不能去，我打李长江后有发展。皖西方面，我挺进团已到桐城、潜山。大别山方面，我李先念正向鄂东发展，桂系已应付不暇。淮北方面，李仙洲亦绝不能深入。皖南方面，我正派曾希圣过江收容，再在芜湖一带创立根据地，项英一部在浙境孝丰活动。三、四月间德必攻英，英必被打得七零八落，那时蒋必大慌。故国内外形势日益于我有利。蒋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举是不可能的，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

一九四一·二·二八

兹委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所属各师之军政负责人如下：

1. 粟裕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
2. 张云逸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
3. 黄克诚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
4. 彭雪枫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
5. 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
6. 谭震林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
7. 张鼎丞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皖南事变（资料选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问题致周恩来

一九四一·三·二

(一) 三月一日指示谅已送达。

(二) 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我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三) 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1、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议，我并未错；2、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3、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通过拥护政府十七日命令，发布讨伐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4、国际形势已到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5、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

(四) 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五) 目前政治斗争空前尖锐，许多小党派已经转到蒋介石方面，在参政会内可能造成不利于我之

空气，但这是一时的，过一会即将起变化，故小党派的话不可听信，他们的话是使我们上当的。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

一九四一·三·四

(一) (略)

(二) 蒋将继续增加对我压迫，请作准备。

(三) 蒋演词强调日本南进对中国的严重性，大概中英要订作战协定了，国民党牵入英国圈子后，投降越困难，剿共也越困难，故对我有利。

(四) 参政会通过拥蒋案以报复我之不出席，但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只待欧战大打，国民党气焰就会降低。

(五) 宜川增兵尚无所闻，但有可能的。华中则绝无办法，九十二军侯、马两师占涡阳、蒙城后，敌隔河炮轰，侯、马又走，我彭部三四四旅仍在涡河、新黄河间，请告刘兄。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一九四一·三·一二

(一) 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使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

(二) 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

(三) 六日蒋演说,似有去年四月程潜在西安报纸上发表谈话宣布我十大罪状相似的用意,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参政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四) 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

(五) 对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拟不作防御式的答辩,置之不理,而利用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由中

央去一电，重申双十二条的必要，给他正面一攻，你以为如何。

(六) 小党派中国社党与青年党已暂时变成蒋介石工具，但真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黄炎培、张表方等派依然是中间派。

(七) 胡宗南对关中进攻已停止，我反扩大了一个区的地盘，边区四周已平静，皖东桂军被日寇打得七零八落，李先念在鄂东有发展，莫树杰之八十四军忙于应付。陈大庆在鄂中，李仙洲在淮北，亦无能为力，各方面有皆顿之势，再过两个月欧战大打，南洋紧急，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致司徒美堂先生等复电

一九四一·三·一四

美国纽约全美州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先生、阮本万先生、部长吕超然三先生勋鉴并转全美洲侨胞公鉴：奉读一月八日代电，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乃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一月十七日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及将该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给予全民抗战以极大之损害。当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如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由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团结幸甚，抗战幸甚。

毛泽东寒（三月十四日）

○新中华报 一九四一·三·二〇 〈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电复美州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先生等〉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关于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致周恩来

一九四一·三·一五

(一) 同意你的意见，由你处写一回答六号讲演的东西，中央对八中全会不再发文件。

(二) 延安「新中华报」已有一篇社论泛评参政会及当局反动政策，未提蒋演说。

(三) 你处发表文件，似亦以泛论为宜（如申明十二条的必要性等），不提蒋演说，不作防御式的答辩。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关于国际关系与国共关系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一九四一·三·一七

(一) 蒋急于转圜，似乎是由于近日国际关系。

(二) 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英美要阻止日苏订约、命蒋向中共转圜，蒋亦甚惧日苏亲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则利用国共恶化，有求苏助日制蒋意。

(三) 如日苏只订经济条约不订政治条约，则蒋有答应我临时办法各条可能，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均可能一时恶化。

(四) (略)。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关于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问题致周恩来

一九四一·三·二一

(一) 党派委员会问题中央还未讨论，请暂时不要答复他们。

(二) 请你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是否更妥当些，因蒋目的在使我加入党派委员会，束缚我们手足。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电福斯特同志祝寿

一九四一·四

毛泽东祝贺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之六十大寿，内称：

致福斯特：值此六十寿辰向你致贺。你对美国共产党及劳工运动的领导使美国无产阶级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当战争与华尔街的反动计划残暴的破坏着和平均的生活，并猛烈的打击着美国人民的公民利时，工人阶级与所有进步人士将更加团结在你所领导的美国共产党的周围，进行着为和平与民主的胜利斗争。

毛泽东

○新中华报 一九四一·四·二四 〈毛泽东同志电福斯特同志祝寿〉

关于国共继续团结抗日问题致周恩来

一九四一·四·二六

(一) 见蒋时可以提出你回延参加大会的要求，要他派机送你，并问他对我们大会有何意见。

(二) 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二·一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甲) 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乙) 我们的党，虽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这些倾向，假如听其

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在某些同志中是确实存在着的。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的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1) 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2) 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治，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3) 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的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的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丙) 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

(1) 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整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

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2) 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 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的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但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 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 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 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一〇

☆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 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

☆ 共匪反动文件汇编(二) 国防部新闻局编印

接见绥米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四一·八

（本市讯）毛泽东同志昨在边区政府接见绥米学生参观团代表十余人，询问绥米民情及民众呼声，象家人会聚一堂，问话及解答所提问题，约二小时，并再三叮嘱他们说：

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干好，这和你们的希望是一样的，盼你们回去后，把这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姊妹们，并努力学习，帮助改进当地工作。

最后，由该团代表献旗一幅，题文：「你是我们的光辉旗帜。」

○解放日报 一九四一·八·一五

电唁张冲先生家属

一九四一·八·一三

张淮南先生家属礼鉴：惊闻淮南先生逝世，至深哀悼，特电致唁。

毛泽东元

○解放日报 一九四一·八·一六 〈毛泽东同志等电唁张冲先生家属〉

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

一九四一·九·二六

(甲) 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

(乙) 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丙) 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

(丁) 在不妨碍各同志所负主要工作任务条件下进行此种学习。

○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

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一一

中央书记处

六二

为王观澜同志的题词

一九四一·一二·一六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

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大公报 一九六一·三·一六 〈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疾病〉

☆人民日报 一九六三·一一·二八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七·二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对于病的态度〉

△中国青年 四期 一九六一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一九四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按：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在驳斥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时候，曾写过一段论及「自由与必然」的文字。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我们特将这段文字发表。标题是我们所加。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州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六五

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有一个象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文化课本」序

一九四二·一·一七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八·九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

△「文化课本」 延安版

关于全边区部队学习「红四军 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指示

一九四二·一·二三

谭政
莫大骅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解放日报 一九四二·四·一五 〈毛主席号召全边区部队研究「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 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他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地认真地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广大数量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须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我们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的。

(二) 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

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并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三) 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

(甲) 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不论从事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宣传、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医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与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每一部门的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指导所属干部有秩序地进行学习。而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及其宣传教育部门则负总领导的责任。其学习范围，包括如下五项。第一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例如军事部门精密调查敌友我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军事干部；其余类推。第二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例如财政工作人员应熟悉财政政策与财政法令，锄奸工作人员应熟悉锄奸政策与锄奸法令；其余类推。第三是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例如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的经验，加以分析和综合，抽出要点，写成文件，教育所属干部；其余类推。第四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例如党的宣传部门将我党二十年宣传鼓动工

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与总结，编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其余类推。第五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例如军事干部研究军事学，医务干部研究医学等，每一部门均须研究自己的理论。对于上列各项业务学习，各部门领导机关负有供给教材、指导学习及考查成绩的责任，务使所属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业之目的。轻视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观点是错误的。

(乙)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关于进行时事教育的办法，包括督促所属干部看报，对所属干部讲解时事问题，及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等项。关于进行一般政策教育的办法，或为一切干部所应普遍学习的，例如将中央对时局宣言，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边区施政纲领等，督促干部阅读，加以解释及讨论等；或为虽与本部门业务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有使所属干部加以研究之必要者，例如向军事指挥员解释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又须指出，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虽为一切干部所必习，但其份量轻重应依各部门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医生，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其份量应该减轻，而对于党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等，则其份量应该加重。关于政治教育缺乏经常性的毛病，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应有计划的克服之。

(丙) 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范围，暂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宣传教育部门应负责解决课本问题。其教育与学习办法，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或一机关独办，或数机关合办，或采取轮训制，轮流抽调干部集中一地学习，都是好的。在这些补习班或补习学校中应有专任的教职员，辅之以兼任的教职员，在环境不许可的地方，则用小组学习制，以该机关某一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减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员，亦可专用教员。文化班或文化学校，可分为初级的及中级的两种，初级班为不识文字及粗识文字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高小程度为合格。中级班为已有相当于高小程度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中学程度为合格。干部分班应以文化程度为标准，不以职位为标准。此外，某些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虽属知识分子，但尚有补习国文及文法之必要者，则用小组学习制或其他办法补习之。为着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应在党政军机关内提高文化教员的地位，最好的文化教员应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优待。对办理文化教育有功的人员应受到奖励。

(丁) 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

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其具体进行，应采取高级学习组与中级学习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

(四) 四种教育的时间分配及课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脱节，由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负责调理之。

(五) 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须由领导机关加以审查，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须严格的加以清除或批评。

(六) 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则，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许可的地方或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七) 实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定之。

(八) 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人员（教员与职员），应加以严格的审查，并应首先调给之。各级领导人员有参加教课的责任。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经费，应最大量地供给之。

(九) 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人员，尤其是教员，应加以教育。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定之。

○ 解放日报 一九四二·三·二

☆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 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二一

☆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慰问信

一九四二·三·四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我们向你们全体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们致最亲热的慰问。回想从抗战开始，我八路军主力开往华北前线以后，四年以来，你们留守边区，是有很大成绩的。你们曾经胜利的保卫了我全军后方，巩固了边区治安，屏障了整个西北。在四年当中，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军事技术、政治、文化的学习以及内部的工作上，都有了进步。你们并且辛勤劳苦，普遍的进行了生产运动，克服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这些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你们大家全体的团结努力。

现在已经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开始的开始。苏联的工农红军要在今年打败希特勒匪军，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都在为了打倒德、意、日法西斯匪军而紧张刻苦的工作着。我们则为配合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准备反攻，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今天我们的面前还有种种困难。我们双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敌人虽然已经被削弱了，但是还相当强大，并且非常狡猾狠毒；国内的亲日派还未肃清，时刻都在想破坏抗战，破坏我军，破坏边区。因

此决不容许空洞的乐观与粗心大意。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守自己的岗位，严防敌寇汉奸的破坏扰乱行动，加强和友军的团结，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使边区更加巩固坚强。

其次，我们的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还须大大提高。全体战士和指挥员们，必须好好锻炼身体，加紧练习瞄准，投手榴弹，劈刺，各种武器的使用，学习各种战斗动作，提高战术水平。要以大力来组织文化教育，努力克服文盲，克服我军特别是干部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弱点。

我们还须要加倍努力生产运动，这是我们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困难，改善部队供给的最有力的方法。要多种多样，养猪、栏羊，发展棉毛纺织，组织运输工作，我们的口号是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达到完全自足自给的目的。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吃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期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开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全体战士、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全体同志们！今年是我们增长力量、准备反攻的一年。我们希望由于我们大家的积极努力，能够早日举行反攻，到那时我们将把丑恶的敌人从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把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旗帜插遍全国，胜利的光明已经在望，这个日子已经不远。我们在

此伟大的年初，向你们大家致同志的慰问。希望你们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奋发努力。预祝你们今年在战斗、学习、生产和全部工作，将得到新的巨大的胜利和进步。

谨致

敬礼！

毛泽东

朱德

王稼祥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四日

○解放日报 一九四二·三·一九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一九四二·三·三〇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系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今天的

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党史，

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

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的时候，还要同他们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他联合，一方面与他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

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革命的影响，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

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党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象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那

时是作为一个团体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后来陈独秀犯了错误。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反对国民党反共就没有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

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

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那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国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党的历史的发展，中国党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党史」上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立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着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党史研究编者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讲话。

○党史研究 一期 一九八〇

☆教学与研究 四期 一九八一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

一九四二·三

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任务是：除了汉奸及决心破坏抗战团结者外，一切阶层的抗日人民，不论是有党有派，或者无党无派，不论是同情我党的，或者只在一部分纲领上愿与我党合作的，也不论是已经与我党共事的，或者尚未与我党共事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和他们一致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而奋斗。我党长期地坚决地实行这一正确政策，是有了伟大成绩的，全民族的抗战赖以支持，全国的统一赖以实现。这些都是很好的情形。但在另一方面，不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党在政府、军队、党务、民运、文化教育部门内或者是秘密党内，都存在着一部分党员及一部分党组织与党外人员之间的严重的隔离现象，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作风并未完全扫除。这些党员与党组织，至今还不懂得我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与意义。他们违背我党密切联系民众的原则。他们不是密切联系民众，而是孤立于民众之外；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虚心体会民众的心理，而是站在民众之上，自以为是，称王称霸。他们不愿意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把党外人员看作无足轻重。他们不愿向党外人员学习，反以领导者自居。他们对于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或漠不关心，不予信任，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他们对于政权的三三

制不愿坚决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仍取包办态度。他们至今还不明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因此，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为了认真地彻底地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党内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斗争，在一切地方与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同时，规定下列具体办法，要求一切党员与一切党组织认真地坚决地实行之。

（一）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

（二）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占三分之二。如当选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足三分之一时，党组织不得指派未当选的党员去凑足三分之一，更不得排挤当选的党外人员。在这些机关中，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

共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

(三)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民众团体及其他机关中，凡须经过人民民主选出的工作人员，其任免办法均按前三三制的规定。其他不需经过民主选举的工作人员之任免，亦不应以是否党员为标准，而应以是否赞成抗战团结及本人能力、经验、学识与工作积极性等为标准，实行用人唯贤的正确方针。

(四)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及一切已有或应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中，党支部的任务是：对于党员进行党的教育，领导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团结党外人员，保证该部门工作任务的完成。支部不得直接干预行政领导，更不得代替行政领导。在行政关系上，党员必须服从行政的领导。在党外人员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部门中，该地或该部门的党组织及党员对行政工作有不同意见时，应取适当方式，与党外人员协商解决，不得直接处理。某些地方党政不分现象，应该纠正。党员如有违犯行政法规者，应受行政的处分；其错误涉及党记者，同时须受党纪的制裁。但在行政关系上，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党外人员，亦须服从上级行政的领导。

(五) 党员及党组织不得任意地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必须从友谊中细心了解自己周围的每个党外人员的历史和特性，细心了解他们对人民、对党及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及生活习惯，必须加以尊重。须知党外人员的愿与我党合作与我党的尊重党外人员，是彼此合作

中不可缺一的条件。

(六) 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院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七)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八) 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过失时，有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采取适当方式，以诤友的态度，适时地诚恳地告诉他以所犯过失的真实事实及正当理由，并与他协商改正的办法，帮助他改正过失。决不可采取缄默不言、听其积累，或当面不说、背后议论的态度，须知这种态度是只会妨碍合作与不利于党外人员的。

(九)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在工作

上，应给以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在学习上，凡在一切有党外人员的机关、学校中，无论在职干部教育或学校教育，党外人员均与共产党员有同样的学习权利。在物质上，不是空唤优待，而是按工作情况、工作需要及现有物质条件给以真正必需的帮助，并须使党员了解这种帮助是应该的。

(十)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机关、部队及学校中，党的一般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允许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党外同情分子到会旁听，并得发表意见。

(十一)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员与党外人员联合一起的干部会议及座谈会，与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

(十二)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党的组织部或管理干部的部门内，设置管理非党干部的专门机关，担负对党外干部的接洽、登记、了解及照顾的责任。在党的各级保护健康委员会内，设置党外干部科，管理党外干部的保健工作。

党史研究编者注：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稿，后来没有发。

○党史研究 三期 一九八一

给李鼎铭的一封信

一九四二·四·二九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革命文物

四期

一九八〇

九八

四月二十九日

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电报

一九四二·八·四

陈毅同志：

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于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情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毛泽东

八月四日

○文献和研究 一九八三年汇编本
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精兵简政的一组函电 下绝大决心

庆贺英工人日报复刊电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

英国工人日报：

我们热烈庆贺工人日报的启封，并坚信复刊后的工人日报将继续是团结动员英国一切力量，战胜纳粹主义的号角。工人日报的复刊，不仅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有力因素。

我们庆祝你们的成功，和日益接近的反法西斯事业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解放日报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

〈中共中央电贺英工人日报复刊〉

对刘少奇「论党内斗争」的按语

一九四二·一〇·九

关于如何处理党内矛盾，少奇同志是有丰富经验的。当他的「论党内斗争」的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毛泽东同志曾加过这样的按语：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讲演，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

○艰苦岁月 肖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一一

☆解放日报 一九四二·一〇·九

给中共北方局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二·一一·一七

德怀同志：

(一)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军事学校或党校。

(二) 胡服同志现到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毛泽东

十七日

○文献和研究 一九八三年汇编本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精兵简政的一组函电

送大批

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

官僚主义者的画像

〔年月日不详〕

毛主席有一次在延安干部会上，讲到官僚主义问题，他说官僚主义的特点主要是脱离群众，他随口念了一首旧书上咏泥神的神像来比喻官僚主义者。他说，

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它方面都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

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一九四三·一·二五

生产是目前边区的中心任务，而农业生产更是全盘生产工作的中心。要完成这任务，首先要依靠边区农村中的三十多万个全劳动力和三十多万个半劳动力。这六七十万人，只要组织起来，便是一枝雄健的生产大军，便能发生雄厚无比的力量。

可是要把边区农村的几十万劳动力更好的组织起来，必须采取许多有效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劳动互助。

在边区农村中，历来就存在着各种各式的调剂劳动力的方式；如「变工」和「札工」，就是流行较广的方式。自发的「变工」和「札工」，其范围虽然狭小，仅限于亲戚、朋友、邻舍等关系，可是它是适合于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如果能因势利导，有计划地组织领导，便可以使它成为发挥劳动力、提高生产的组织。为了证明这一点，延安县的宝贵经验，是值得称述的。去年延安县共组织「札工」四八七个，另外吸收好劳动力四、九三九个参加集体劳动，几乎占总劳动力三分之一，即三个人中有一人参加集体劳动。在开荒的时候，集体劳动就显出很大的力量，去年延安县要在一百天中开荒八万亩，每天

要开八百亩，自三月十日到四月十九日前，还只开了一万五千亩，只占总任务的百分之十八·七，尚差六万五千亩，但时间已去了三分之二。所以十九日下雨后，采取开荒突击二十天，在二十天中，竟完成了四万六千四百四十二亩，占总任务百分之五十八。假若延安县没有把劳动力及时组织起来，那末便没有办法抓住雨后的绝好时机进行突击，而八万亩的开荒计划也没有办法完成了。

我们知道，做庄稼最要紧的，是「不违农时」。早晚下种，会有不同的结果，迟早收割，也会有不同的收获。要做到「不违农时」，只依靠单独的和分散的劳动，是难乎其难的。假若采取劳动互助，情形就大不同了。把三五户七八家的人力畜力，组织在一起，今天大家一齐帮你耕，明天大家给我种；那一块地草多，就给那家先锄；那家庄稼早熟，就助那家先收。在「变工」中，不仅有人工换人工，而且三个人工还可以换到一犍牛工，办到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

经验证明：互助的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节省劳动力，集体劳动强过单独劳动。如：一个劳动力一年可以耕种十五垧地，但若三个劳动力一齐干，一年就可以耕种七十垧地，四个劳动力更可以耕种一百垧地。两个人力一犍牛力，三天可以做完的工，如果用三个人力一犍牛力，两天就可以做完。不仅如此，互助的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还可以大大发挥劳动热忱，增强生产效率；因为大家一起工作，生活活泼，情绪紧张，互相鼓励，互相竞赛，谁也不肯落在人后，工作进行的紧张程度，正像群众说的：「工变工，挣断筋！」最后，互助的集体的劳动组织，是真正群众的组织，便于我们党的和群众团体的

工作同志，进行教育群众，增进群众团结互助的精神。

正因为这种互助的集体的劳动组织，能使庄稼不违农时，调剂和节省人力畜力，提高生产热忱，增进劳动效率，发物群众的团结互助精神，所以它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

流行民间的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是「变工」和「札工」，但是也并不仅限于这两种。如象劳动英雄吴满有，既不「札工」，也很少「变工」，他在平常帮助本庄的移难民，一遇农忙，那些移难民也就自愿的帮他做工。再象「伙牛」「伙种地」等等，那是带有互助性质的。这些流行民间的劳动互助组织，内容是非常生动、具体和切合实际的，都应当及时倡导和推广。

我们必须学习延安县的模范，对于组织劳动力这一重要问题，放弃消极的自流现象，采取积极的领导提倡。不仅仅鼓励组织「札工」，而且要更多更普遍的组织「变工」；由旧的比较狭小范围内的组织，转到有组织的新的「变工队」。我们首先要在今年春耕中，大大推广这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一切具有劳动力的——身体强壮的、老弱的、儿童与妇女等，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劳动互助的组织，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防止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强迫命令、或「抄名单」的形式主义。我们若果硬要把某些没有明白互助好处的人，勉强组织在一个「变工」或「札工」队里，或者造了名单，以为「万事大吉」，那么，生产效率和劳动情绪不但不会提高，而且反而会降低。

再则，组织劳动互助，是最生动具体的事情，绝不能够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千篇一律的去对待。比

如我们今天努力扩大那种民间劳动互助组织，所组织的「变工」队不应过大，不应以乡或以行政村为生产单位，因为组织广大了，会浪费人力、浪费时间。最好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对于那些人口多、更需要互助的村庄先着手，不仅只组织一个，而且可以组织几个、几十个，也不仅限制在一村的范围内，还可以超出自然村的范围，实行村与村的互助。

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经过群众慎重选择，公举出在群众中有威信、生产积极、有办法的人出头领导。我们的乡村干部和党员，要首先参加进去，或者就以党的小组为骨干，组织成「札工」队，起模范推动作用，并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群众教育、团结群众。我们的农村支部、乡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同志，一定要把组织群众生产看作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某些同志以为「这些事群众自己会搞，用不着咱们担心」，这种不正确的观点，一定要严格改正。

今天，已是四九将完，人们常说：「春打六九头，犁牛遍地走」，让我们迅速把这一支生产大军组织起来，掌握春耕，不失农时，完成农业生产的重大任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一九四三·二·二六

五年余以来，我们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与敌伪作艰苦的斗争，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获得了辉煌的成绩；主要是依靠着八路军新四军与广大的人民，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妇女工作是有成绩的。可是由于我们在妇女工作中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缺乏深入下层，埋头苦干；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建设对于坚持抗战，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没有把经济工作看做妇女最适宜的工作，没有把握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不顾及她们家务的牵累，生理的限制与生活的困难，不考虑当时当地的妇女能做什么，必需做什么，就根据主观的意图去提出妇女运动的口号，规定计划，成立团体，要妇女经常出来开会，对她们作不必要的动员，浪费她们一些人力物力，致使工作一般化，组织形式化，缺乏真实的群众基础。这种脱离妇女群众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倾向，是使妇女工作停滞不能更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因。

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要务，而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为实现上述的方针，各地妇女工作作风、方式、方法，须有彻底的转变。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妇女群众的生活、需要、情绪，顾及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选择中心地区开展工作，逐渐影响邻近地区，以至于推动全局。因此：（1）各地妇联合会妇救会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深入村庄，教育帮助与解决农村妇女参加生产战线中的困难，农村妇女生产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妇女工作的尺度。（2）农村妇女能纺织、能养蚕、能种地、能煮饭、能喂猪、能理家……应该按照各地具体情形来作计划，但她们的生产计划，一定要和她们家庭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不可能妇女孤立地去做，不要重复过去某些地区只从形式上，数字上标榜妇女开了多少荒、建立妇女林等没有实际内容的缺点，要动员妇女实实在在在参加到广大群众的生产中去。（3）根据妇女群众的需要进行组织，纠正过去有名无实的组织方式，以生产合作及各种生产方式（如纺织小组等）去组织她们，这些组织应该成为妇救会或妇联会的基本组织，而不是办一些有名无实的空团体、空机关。（4）尽量减少对农村

妇女不必要的动员，减少开会，爱惜她们的人力物力，使她们有更大力量从事生产。（5）妨碍身体健康以致影响生产的，如小脚及不注意卫生等，应当鼓励妇女改革之。（6）对于妇女文化的政治的教育，应通过生产方式去进行，如提高生产技术，认识有关生产的文字，编制在生产时的歌曲小调等。（7）妇女干部要消除轻视经济、生产工作的错误观点，必须了解生产不仅是根据地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而且妇女工作者要密切与巩固和农村群众联系，只有从深入农村中去组织妇女生产，解决其生产困难，增加其经济利益着手。要做到此点，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习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今年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方针，就是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工作。各地应按具体情形规定详细办法。

○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

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三

△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文件

一九五三

为志丹陵题词

一九四三·五·六

一九四三年，刘志丹同志壮烈牺牲七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迁回志丹县（原保安县）修建陵墓。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了「刘志丹将军墓」的墓碑，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

○怀念毛泽东同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二

☆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

视察南泥湾时的讲话

一九四三·七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立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立更生为主，我们不能象国民党，他们连棉布都要靠外国人。

○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七·二

给冀察晋分局的电报

一九四三·八·五

冀察晋分局：

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已悉。毫无疑问，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现在只有九十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九十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八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决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减去三万人中，除吕部六千西移外，另调聂部四千西移，共计一万人西移，其余两万在本地安插。如果明年更困难，再准备从五万中减一万。

中央书记处

未微

○文献和研究 一九八三年汇编本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精兵简政的一组函电 对精兵

简政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九四三·八·一一

德怀同志

关于一面支持斗争，一面大批保存干部的观念，除你以外，大都是不正确的。聂区所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中央已去电要他们从直属机关、学校（党校、抗大）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可有一部分最好的中级干部）。请你和刘、邓、杨、黄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干部五百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资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毛泽东

未真

○文献和研究 一九八三年汇编本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精兵简政的一组函电〉

一面支

持斗争一面保存干部〉

给彭德怀的电报

一一三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八·一五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一、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它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首长负责，就是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门不在此例，对于这些部门，必须首先改造领导）。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于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学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逮捕审讯）的约占百分之十。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

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就是从当地最高负责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须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人的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着这些核心乃是广大的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地给以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耐烦耐劳，审查工作才能彻底收效，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调查研究，就是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在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分清是非轻重，就是用调查研究方法，第一，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它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的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分子（后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收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

争取失足者，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查出二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

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的，许多人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争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培养干部，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至八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及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二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使特务不容易再侵入，才为将来准备了大批的锄奸干部，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好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就是在此次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中，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经验，积极性发扬了，眼睛打开了，觉悟性提高了，党才真正巩固了。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脱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党过去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组织问题上的右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地上级不可代替下级，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级审查大部分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区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它坏人、肃清反动分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内抽调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或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地代替下级，代替他处则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就可以解决偏向的问题。

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针与经验，希望各地同志研究采用，并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创造你们自己的经验。

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参杂着进行。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

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它部门及其它地方，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或地方，便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 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一一

☆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七·二二（节录）

给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

一九四三·八·一六

小平同志转太行分局各同志：

中央给冀察晋分局关于保存干部电转给你处，谅已收阅。希望你处照此电意旨同样正确地处理此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提拔中下级上来代替他们的职位。你处中级干部及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亦可送来，但不应放在上述数目之内。

中央书记处

八月十六日

○文献和研究 一九八三年汇编本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精兵简政的一组函电 抽调有
造前途的领导干部送延安学习〉

接见外地来延安的工作干部时的讲话

一九四三

你们都是从外地来延安的，首先要习惯住延安的窑洞，也要学会住延安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够指挥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现在把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也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所以你们要看得起延安的土窑洞，要学会住延安的窑洞。

○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七·二

对延安市民众代表的讲话

一九四四·二·七

（本报讯）延市人民秧歌队及民众团体，以无比的欢欣，在七日下午向毛主席献旗。当秧歌队向杨家岭前进时，附近老百姓都赶来参加，表现着人民对毛主席的最大拥戴。「中略」毛主席在掌声雷动中向大家讲话。他说：

今天本市人民秧歌队、市政府、市商会、市群众团体，来这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献旗，这个意思很好，我代表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刚才诸位送来旗子，又讲了许多好话，这个意思很好，我们共产党人更加努力的工作，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些，来回答你们。毛主席说：现在全世界全中国都在团结一致打法西斯，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已经团结一致，今年更要团结一致，为增加生产，巩固后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边区已有进步，今年还要进步，共产党人愿意和边区人民打成一片，听取人民的意见，使工作做得更好些。」

毛主席讲毕，接演秧歌故事十多种，极为精采，中央办公厅招待晚饭，天黑方散。

○解放日报 一九四四·二·一二 〈延市民众代表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

柳树和松树

——对随军南下干部的讲话——

一九四四

还要学会两种本领，头一个是松树的本领，第二个是柳树的本领。松树发育成长，不怕刮风下雨，严寒之中也能巍然屹立，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插到那里都能活，一到春天，枝长叶茂，随风飘荡，十分可爱。柳树有「灵活性」。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缺一不可。

○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 (节录)

☆教育革命 五期

☆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七·二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一九四四年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 一九四四·四

编者按：一九四四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恩来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五十一年，特将全文公开发表，供全党全军学习。

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

从一九四二年冬季西北中央局召集的高干会及军政干部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还在前年高干会时，我党中央及西北局各同志就指出：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有革命优良传统传统的军队，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全国境内一部分最好的军队。而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是在基本上完成了党与上级给予他们的任务的，是执行了党与上级的路线的。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的部队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偏向，其中最主要的是所谓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偏向，犯这种毛病的程度各有差别，而当前的任务则是一致起来纠正这种偏向，发扬优良作风，改变不良作风，以便更好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一年以来，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指示，并在基本上完成了指示所给予的任务的。

一年工作的结果，在军党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干部上下级关系上，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上及各部分军队间的友好关系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这些都是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曾经借以表现它的地方。在军党关系上（所谓军党关系上，即是说我们的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我们不但建立了在边区范围内以西北局为中心，在各分区范围内以地委为中心，同时又保持各自的上下级关系的统一领导，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政策思想上，行动步骤上，也趋于一致了。在军队与政府，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上，经过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运动，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以来，军队方面坚决实行了自我批评，实行了坦白运动，将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一切不良现象，都讲出来，彻底改变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对

民众关系不好者，实行改善关系，归还借物，赔偿损失，争论事件错在军队者实行向民众赔礼道歉；军队又大规模地从事生产自给运动，改善了给养，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军队又以大量的劳动力帮助民众生产；这样就使我们的军政军民关系大大的改善了。在军队内部关系上，无论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凡属存在着缺点的，均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连队军人坦白大会上，将官兵关系上，连队生活上，个人思想上，一切不良现象，不满心理，都讲出来，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增进了亲切友爱的空气，纠正了各种不良现象，平复了不满心理，团结了军队内部。所有这些方面，虽然至今仍然存留着若干缺点，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克服，但和一年前比较，显然是大不相同了。总而言之，部队中多少存在着的以脱离群众为其主要特点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是基本上被克服了。

在上述这些改造与进步情形之下，部队的情绪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部队中存在着的若干消极情绪与不良行为，现在一般均已消失，而为新的情绪所代替了。现在的部队，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与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这种热情与朝气，从去年春季开始高涨，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去年的开荒、锄草、秋收，往后又紧接着转入整训，中间经过七月间的战斗动员。其特点是：紧张性、普遍性与持久性。现在部队是充满着进取心的。在生产中，在拥政爱民中，在冬季整训中，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成批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出现了，许多的模范班、排、模范连队出现了。军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是增强了。经过精简改编之后，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现象是被改变了，若干官兵脱节的

现象，是被克服了。违反纪律的现象也大大减少了。

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某些环节上的领导作风有了大的转变，军阀主义作风与教条主义作风都受到了批判。现在极大地发扬起来的作风，是联系群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了。

所以我们说，去年一年是我们部队中实行整顿三风的成绩，精兵简政的成绩，拥政爱民的成绩，生产运动的成绩，防止奸细的成绩与冬季整训的成绩。如果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进步，这样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特点，就是它是后方留守的部队。它守备了数百里河防，但因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敌人还不敢越河进攻。这些都是和前方部队不同的。但其他一切则都大体相同。特别是在领导作风问题上，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进步，可以为一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所仿效。我们是怎样取得这种进步的呢？

这种领导作风的进步，其过程是从军党关系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从军队总的领导关系到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而论，又是从高级干部到一般干部，从干部到士兵，从党员到非党员。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各方面的一系列进步，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去做；如果去年的进步不是首先抓住军队总的领导关系，亦即抓住高级领导干部，使之打通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作风，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指导，作为推动一般干部，影响士兵群众的前提，而是只从下级与士兵身上求解决；如果我们的同志在领导上确有毛病，而在检讨

这些毛病时，却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不肯揭露自己的错误；那末，这种伟大的进步就将成为不可能，至少是不会有这样大与这样快的成绩。去年一年的经验证明，凡是依照这种精神与这种方法做去的，成绩就很大，进步就很快。反之，成绩就不大，进步就是很慢的。

去年的经验证明，干部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艰巨的。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而如若离开思想进步去求什么工作上的进步，便必然只会是表面的与形式的。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真理，已为去年的经验所完全证实。如果我们要从若干错误的领导作风变到正确的领导作风，要从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表现得最典型的部队，在改变这种作风之后，就能飞跃地前进，要使落后分子改变为积极分子，要使自由主义的空气改变为原则立场的空气，要使不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改变为好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此等等，都是要从人们思想的进步才能进到行动的进步。差不多可以说，思想的进步过程，就是工作的进步过程，就是群众情绪的进步过程。那里的思想改造做得愈彻底，那里的工作，那里的群众情绪，那里的工作作风的进步也就愈彻底。

根据去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大体上应该是：第一步，揭露错误；第二步，反省错误；第三步，改正错误。没有前两个步骤，就不可能实现后一个步骤。在一切存在着毛病的部队中，三个步骤中，头一个是首先重要的。没有这个步骤，或这个步骤进行得不彻底，就是说，不揭露错误的本质，不对明明错了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评，就不能警惕干部，就不

能发动干部对于检讨错误、批评错误的积极性。而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不揭露错误，就无法测知他对自己错误的态度，就无法使他进行自我反省，即使反省，也会多是表面的、应付的、没有下决心的，因而要他改正是不可能的。去年，边区各部队曾经检讨过那里的错误，检讨那里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开过坦白大会，进行斗争反对军阀主义偏向以及那种对于这个偏向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即所谓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次没有做好的又来第二次，第三次，最后果然是做好了。那些至今还没有做好的，便是对于揭露错误做得不彻底，或做得不适当。

但是这里所谓揭露错误，是有方针，并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轻率的随意的指责。我们的方针就是教育干部，改造干部，就是教育士兵，改造士兵，而不是毁伤干部，谩骂干部，而不是毁伤士兵，谩骂士兵，只要犯错误的同志大胆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采取过火的斗争方法，不采取处罚与打击的方法。在整个整风运动中，我们是执行了这个方针的，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坏分子之外，对一切有毛病的同志，都是没有执行纪律处分的。一时转变不了的，在整风班及干部队，慢慢进行改造。我们这样做，是收到了效果的，大部分有毛病的人都转变过来了。许多人并且转变得很好。干部中缺乏和蔼态度，缺乏勤勤恳恳教育士兵的态度，缺乏问寒问暖关心士兵的态度，缺乏关心民众疾苦的态度，缺乏廉洁奉公态度的人，现在是改变了，学好了。干部学好了，士兵也学好了。士兵中的二流子变为好人了，想开小差的不开小差了，不满的满意了，破坏纪律的遵守纪律了，懒怠的勤劳了。总之，不论官兵，都面目一新了。这里，我引一个边区部队中的典型例子来说明

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性。

下面是一个部队的工作报告：

「思想上的转变，可以部队中积极分子的增多和落后分子的减少来说明。在去年三月刚整编时，党员积极分子只有七十七人，非党积极分子只有三十一人。而到去年十二月，党员积极分子增加为一百六十二人，非党积极分子增加为九十五人。刚整编时，党员落后分子有五十五人，非党落后分子有八十二人。去年十二月，党员落后分子减少为八人，非党落后分子减少为十五人。可见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干部中贪污浪费，私人做生意，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士兵生活的现象是被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一年。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销了十多个，其中计有营长两名，政教两名，连长两名，政指两名，卫生队长一名，民运干事一名。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如果依然采取单纯的处罚方法的话，那就要撤换更多的人，并且事情也一定不会变好。但在一九四三年，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废止了单纯处罚的方法，采取了改造思想的方法，一个人也没有撤换。经过整风与反省，经过坦白大会，经过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过去犯错误的人都在这种伟大的运动中转变过来了，还是这些人，但是一个整年中没有发现一个再犯严重错误的人。」

上述的这个部队，是边区部队中工作与纪律最不好的部队，这是极坏的典型。但因为揭发了错误，展开了群众的自我批评，改变了领导作风，提出了正确的积极的任务，并且掌握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便很快的转变过来了。至于大多数工作基础好的或较好的部队，一经按照正确方针认真整顿，其进步更是

很快的。

由此可见，工作的做好，纪律的维持，是建筑在领导正确与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领导正确这个条件，正如列宁所说：「整饬纪律的企图，将不免流为空谈和虚妄。」而在领导正确这个条件一经获得之后，就要着重群众的自觉，去年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一点。过去许多领导机关，对于干部及群众中发生的消极现象，不去检查领导，不去从转变领导着手；不去掌握思想，不去从改造思想着手；并且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不去从爱护观点出发促其反省与自觉，而只会用简单的处罚方法，实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只有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揭露具体的错误到督促犯错误者（包括干部与士兵）反省自己的错误，勤勤恳恳地好心好意地推动他们自动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一个路线，才是完全正确的路线。

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作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部队中以改造思想为目的的整风运动中，斗争目标，是集中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与对此偏向的自由主义态度上面，所谓揭露错误也就是揭露这些，这些目标以外的东西，只是联系着它（可以联系与需要联系的），而不去强调它。不要企图同时改正一切不良的东西，而应集中力量批判最主要的一点，其余就会迎刃而解。在一定的斗争目标下，对于联系具体的人一点来说，也应该选择典型，不应该采取平均主义。这种典型的批评方法与典型的教育方法，是最有力量与最有教育意义的正确方法；平均主义的批评方法与教育方法，则是最没有力量、最没有教育意义的错误方法。

去年一年，我们在部队的实践中，发扬了统一领导的思想，拥政爱民的思想，生产自给的思想，提高军事技术的思想与防制奸细分子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教育与实践中，不但军阀主义偏向受到了批判，教条主义偏向也就同时受到了批判。我们的军政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已经能够不受教条主义作风所束缚，抛弃了脱离实际，专尚空谈；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那些不良作风，而懂得了遇事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并懂得了选择典型与抓住典型的方法；懂得了不但要注意事件的形式，尤其要注意事件的内容；懂得了不但要照顾少数，尤其要照顾多数。在进行教育时，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懂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孤立主义的束缚中，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

去年一年的经验使我们懂得，领导作风上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其共同结果，都是脱离群众，而教条主义则特别表现于脱离具体的实践，而以抽象的空喊与形式的整齐为满足。反之，去年工作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还因为我们在克服军阀主义偏向之时，我们就从基本上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领导方法。采取了我党中央所指示的正确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每一运动，每一工作，都是先使组成领导核心的各级主要干部先懂得，然后采取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去进行思想动员与舆论动员，使一般干部与广大群众也懂得，然后才动手去做。在动员的过程中，都是根据各旅各团的情况去规定各旅各

团的总计划（一般号召），然后根据这种旅团的计划及各单位的情况去更具体地规定班排连营的计划，以至每一个人的计划（具体指导）。在执行的过程中，又根据实践经验去检查这些计划，并修正这些计划，使高了的减低些，低了的提高些（具体指导）。在动员过程中，又是使政治工作同志与军事工作同志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在每一部队中最有威信的首长的统一指导下，协同一致去做，故无各自为政之弊。

去年许多大的工作，都采取了革命的竞赛方式。但当群众的情绪还没有觉到需要实行竞赛的时候，就不应发动竞赛。当这种竞赛情绪在群众中酝酿到大体上成熟的时机，便应立即号召竞赛，并用一切力量组织这种竞赛。这种时机成熟的标志，就是不仅积极分子方面精神上已有充分准备，而且中间分子方面（他们往往占多数）与落后分子方面，也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准备，否则竞赛便会变成少数人突出，只是少数人在做，不是多数人做起来的。去年生产运动开始时，有些部队发动竞赛的时机选择不适当，发动过早，只看到少数积极分子的情绪，没有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情绪，结果这种竞赛的号召便落了空。后来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重新组织竞赛，便得到了成功。在生产运动与练兵运动中，凡是不但照顾了中间分子，而且照顾了落后分子的，竞赛热情就愈弄愈高，竞赛规模就愈弄愈大，一直坚持到底，完全成了群众自己的事业，不要领导方面的督促。我们必须懂得，在各种人们的觉悟程度上，中间分子比较积极分子是有距离的，落后分子比较中间分子又是有距离的，领导的任务，就是在于团结积极分子，吸引中间分子，鼓励落后分子。而我们团结积极分子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于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一道儿前进。离开这个目的，积极分子就失去作用，我们组织积极分子的工作，就是多余

的事。因此，在任何一个带群众性的运动中，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上，在我们的组织步骤上，首要的问题，是照顾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问题，要从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出发，要选择为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也能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要适应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进度，而规定整个运动的进度。例如，我们在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组织张治国运动，郝树才运动，胡青山运动，赵占奎运动（不是职工运动的赵占魁），武生华运动，冯振僧运动，冯国玉运动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先进战士与先进的初级下级干部，是本部队生产运动或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为本部队战士群众所熟知与亲眼见到，容易吸引中间分子与鼓励落后分子，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容易激起他们的上进心。因为群众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来体会问题，不是从口号来体会问题的。如果我们的鼓动是脱离具体人物，具体事迹的鼓动，便无法使群众了解，无法激起他们的上进心。但是当我们鼓励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向先进分子看齐时，必须不忘记中间分子与落后分子的特点。例如在生产劳作形式上，必须依据体力强弱，并采取相当的自愿原则，将劳动力划分为甲乙丙三等，采取不同内容与不同程度的劳作形式，较之平均主义的与完全命令式的劳作形式，就会更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分别，我们就会要脱离群众。

在改造落后分子的工作中，主要应采取耐心感化的方法，禁用单纯惩办的方法。对于逃兵也不是单纯惩办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用教育感化方法，更要绝对禁止枪毙逃兵。在这里，首长们从爱护观点出发的亲切谈话是最有效力的，一定要把这种首长谈话与群众中的自我检讨自我教育配合起来，才

能发生更大的效力。单纯的惩办，甚至打骂的方法，只是一种脱离群众而毫无效果的方法。军队中一定要废止谩骂与肉刑，坚决执行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把从爱护观点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的勤勤恳恳好心好意的教育感化工作，去代替谩骂与肉刑（打人）去代替单纯的处罚方法，并且一定要把谩骂与肉刑以外的、必要的、即按照实情必不可少的正当处罚方法，也减少到最低限度，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形之下，决不轻易采用处罚方法。

一年的经验是很多的，我在这里讲得很不完全，例如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生产运动，练兵运动与防奸运动，均有各自的宝贵经验，我在这里没有一一说到。我所指出的，只是一些共通的主要的经验。并且也不是说，我们部队的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已经全部的与最后的克服了，不是这样。我们部队中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偏向只是受到了严重的批判，将它表现在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干部上下级关系，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关系，以及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上的显著不良倾向加以克服，基本上改善了各种关系，并不是说这些关系已经完全的最后的改善。要使各种关系获得更加完满的改善，并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根深蒂固坚强不拔的东西，我们必须继续做很多的工作。至于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教条主义作风，在过去一年中也是受到了批判，但是还没有全部克服，尤其是从历史上检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还没有做。下面我想就全军的历史问题加以检讨。而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教条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作风两种作风的比较与分析，着重于政治工作中成绩与缺点的比较与分析。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教条主义偏向，这里暂时不去提

他。

二、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拿了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去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是这样做的，国内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过去的红军中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中所指导的政治工作，更是这样做的。共产党人这在三个时期的革命军队中所做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都是收到了成效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

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他不但是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做的，许多的军事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也都参加了这种工作，同样，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军事工作。这在内战时期是如此的，在抗战时期也是如此的。

以内战时期来说，我们军队在其初期是创造的时期，其中期是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是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其成绩的时期，政治工作也有其创造、发展与受到某些挫折但同时有某些成绩的情形。特别是在内战初期与中期，在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上，在协调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工作上，总之一句话，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工作上是有许多的创造，以至于到今天还成为我们军队的一部分优良传统。

以抗战时期来说，其初期是生动活泼的，是有伟大成绩的。在这时期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于自己的周围，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了大量的民族敌人，以至于能够协助处在正面阵地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保障了中华民族不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这些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在抗战的中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整个军队继续执行了党的路线，与党的许多具体政策，以至于能够抗击了日寇侵华军队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至于能够击破敌伪军无数次的反复的残酷的「扫荡」，能够有效地对付其杀光抢光烧光的所谓三光政策，能够使被敌人再度夺去的许多中国土地，

又被我军再度夺回来，能够忍受史无前例的没有政府接济、缺乏武器、缺乏弹药、缺乏药品、缺乏粮食被服的无限困苦，而为中华民族，为同盟各国，坚持了一条中国大陆上最重要最有力的抗日战线，这些也都是做得很好的，很正确的。

总之，不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整个军队的成绩是伟大的。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也是伟大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和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与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是有功劳的，是对中国人民有了光荣的贡献的。

但是，我们的政治工作（这里只说政治工作），是存在过与存在着缺点的，我们应该采取自我批评态度，检讨这种缺点，克服这种缺点，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例如，当我们提到政治工作中的传统的时候，若干同志往往存在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因而对于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因此，就不免对于某些不好的东西与某些不适合于我们军队当时情况的东西，也都奉为天经地义，当作所谓优良传统在发扬。而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

我们的政治工作，在内战后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就其积极方面说来，这时期的政治工作，曾经执行了反对人民敌人的政策，曾有过许多成绩。这种成绩，主要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例如关于鼓励官

兵的英勇斗争，关于争取俘虏等。在团结军队内部与团结人民方面也有其成绩。例如，关于争取人民参加军队，军队的更加有秩序，军队中许多好的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居民工作中的许多好的工作等。（这种成绩主要是表现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几个区域军队中，在另外某些军队中，由于个别同志在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上的绝对错误，就不但看不出这种成绩，反而摧毁了原有的成绩。）但是，就其消极方面说来，却又产生了一种不正确的作风，这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这种教条主义作风，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在军事教育工作中也是存在的，这里不去论列）。这种教条主义，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表现。就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只凭主观臆想办事，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当时军队的实际，机械地搬运外国经验，不适当地强调当时军队的正规化，割断我们军队的斗争史。这些同志喜欢从口头上，从形式上强调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是在实际上，却放松了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列主义）对于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实际上不甚重视与不甚强调我们军队所应该认真倡导与认真实行的真正的军党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军队间的一致等等基本思想，不是严肃地认真地把这些思想列为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这些基本内容、基本方向，当作不甚重要的东西，却从形式方面重视了与强调了许多不应该重视不应该强调的东西。

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其结果势必产生这样的情形：争取群众的任务有些被轻视了。军队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变了提法，或被认为不必要了。军队内部团结一致的工作也有些放松了。党政军民关系也不去力求亲密了。军队不尊重党政，军队打骂民众，侵犯民众利益的现象，以及军队内部官长对士兵的打骂现象，虽有指责，也不甚得力了。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减弱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潜滋暗长了。由于山头主义与本位主义的发展，军队的这一部分可以不照顾那一部分，主力部队可以不照顾地方部队与民兵，模范队伍可以不照顾落后队伍，从而在主力部队的若干同志中（这里军事政治后勤各种工作同志都有），生长了一股骄气，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爱说成绩，不爱说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惧怕别人批评，也惧怕作自我批评，有些则更发展到对党与上级的领导机关闹独立性的恶劣现象。所有这种情形，有些在抗战时期有了改变，有些在抗战时期先有发展，后有改变，有些则至今还没有改变。

在党内生活上，内战后期曾经普遍采用了过火斗争的方针，缺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军队中的党内生活，也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许多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打击。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了改变，但其残余没有肃清，还发生过若干错误地打击不应该受打击的同志的情形。

在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虽然基本上是团结的，但是存在过某些不协调的情形。在内战后期，曾经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不适当地强调政治工作的地位与权力，并且在实际上是在不适当地强调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党性的差别，对于军事工作者与政治工作者之间，缺乏合作精神

的提倡，是这种不协调情形的来源之一。但是这种不协调，不能一概责备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有些时候军事工作人员也要负责任。

在抗战初期，曾经一时迁就国民党，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这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这是很对的。政治工作在每一部分革命军队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否则这个部队的工作就要受到损失。特别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较薄弱的部队，这样的强调十分必要。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而斗争等）与当前具体任务（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整训运动，防止奸细，整顿三风，统一领导，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改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依当前需要而作具体布置）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如果在这方面强调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特殊性，把政治工作任务与整个军队任务分离起来，那便是不对的，那便会产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目标不一致，使政治工作脱离实际，显得空虚的原因。任何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都是根据情况与任务而产生的，是从属于一定情况与任务的，是应该依据情况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也

是如此。所以，如果离开军队的具体任务去谈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把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与整个军队的具体任务相分离，并把它看成绝对的东西，那是不能不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些同志是认识不清楚的，如果现在还有这种情形，便应加以纠正。

应该指出，所有上述一切缺点，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不是一切部队同样具备的，其间轻重大小，互不相同，正如各部队的优良成绩，优良传统，也是各有特点，互不相同一样。我们的军队始终是革命的军队，其有缺点，好似一个壮健的人有时生了一点疾病一样，很快就会治好的。

还应指出，上述这些缺点，也不能认为都是由于教条主义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与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教条主义思想的存在与没有被肃清，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则是其主观的原因。一九四二年整顿三风以及实施各种改革以来，这些缺点就逐渐减轻了，某些整风深入的部队，这些缺点就更少了。

还应指出，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内战后期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当时党的领导上的教条主义，则军队是不会单独产生怎样严重的教条主义的。

还应指出，当我们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着重在某些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在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后工作的借鉴。还应知道，我们的军队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的思想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某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或是已

经进步了，或是正在进步中，或是一经指出就可能使之进步，根据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应该团结一切从事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同志，不分彼此，共同工作。

但是应使我们的同志深刻认识，如果我们不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革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如果我们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我们就会无力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去教育军队，就会无力巩固正当的军政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就会无力克服军队上下级之间，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以及军队与地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也就会无力克服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恶劣倾向。反之，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军队的具体任务出发，善于调查研究，善于联系群众，那末，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般任务就能完成，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就能达到。中国革命的经验，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经验，都在证明这一论断。

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我们军队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单纯地对敌斗争的任务，四军古田决议中已经明确的规定了这一点。由于我们军队的特殊环境，我们在内战时期，曾经规定以作战、筹款与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大任务。自然，作战是被放在第一位，在战争时期，其他一切都是服从于战争的。但是，如果放弃后二项工作，就不适合于我们的环境。在内战的初期与中期，我们军队曾经艰苦地但是光荣地执行了上述三大任务，这也就是说，在根据地没有建立之前，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建立根据地，而在根据地建立之后，又曾经协助地方党政巩固根据地。这样的任务，就是在抗日战争中也是没有改变的，

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协助当地人民，协助当地党政建立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试问这样强大的民族敌人（全部侵华敌军的百分之五十八与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都担负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身上），这样长期艰苦的战争，怎能支持呢？不过在抗战时期，筹款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提出了军队进行生产运动的任务，借以改善军队生活与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于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今天的任务，就变成战争、生产与做群众工作这样三大任务了。如果把这三个任务，缩小成为一个单纯的作战任务，那就不能适合我们的特殊环境。

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三大任务，过去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军队不走偏向，达到协和全国军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凡属革命军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与后勤工作同志，除应强调专精自己的本业，并指出如果不注意本业则是不正确倾向这一点之外，还应提倡，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同志应学习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同志则应学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并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准备去参加军事工作与后勤工作，或竟改变现有工作职位去做军事工作

与后勤工作。而在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上，则应强调彼此合作。不错，这些工作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因此才分为几种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都是为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一个目的，这些工作的进行又必须取得和谐的合作。因此，凡是能巩固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赞扬，而如果是妨碍这种合作的，即应受到批评与指责。

在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下，革命军队内部的争论问题，只应该是思想倾向与政策方针的原则性的争论，只应该是正确原则克服不正确原则的争论，并且只是因为这种争论，是有助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借以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任何的争论都应该完全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而如果是多少离开这种立场的争论与对立，就都是无原则的，是不应该允许其存在的。

在我们军队中，应该把尊重工农出身的干部与尊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尊重老干部与尊重新干部的方针，同时提了出来，并使这些干部很好的结合起来。应该使人们懂得工农干部的长处，我们军队中有大批的工农干部，他们已在历史上形成成为军队中一部分起主要领导作用的骨干，正是我们军队中的优点与特点（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中也是这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忠诚可靠的，并特别能吃苦耐劳，英勇奋斗。轻视工农干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时，又应该使人们懂得革命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就不能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忠诚可靠的，他们的缺点，经过锻炼（特别是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是能够改造的，轻

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是不正确的（在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民众工作与文化教育工作中，也是这样）。无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他们自己的短处，都不应骄傲，而应互相学习其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

军队中的老干部是军队的主要骨干，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如此坚强的军队。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老干部，轻视老干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应该尊重新干部，因为新干部是我们军队的新鲜血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军队的发展与壮大，轻视新干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老干部尤应随时随地，特别表示欢迎与尊重新干部的态度，以便于从各方面吸收新干部加入我们抗日的军队，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

从地方工作中吸收到军队来工作的干部，新的与老的，工农出身的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都有，这是扩大军队干部的一大来源，我们应该表示尊重、欢迎与和气地同他们一道工作的态度。他们初来时，在工作上有些不习惯，不熟练，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善于帮助他们。

我们军队中，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原有军队干部与新来地方干部的关系，这些问题上，是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的，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宗派主义观点，是应该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养高度的对敌仇恨与争取敌军俘虏二者区别而又统一起来。没有前者，就不能振起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士气，没有后者，就不能瓦解敌军官兵。应该使我们军队的指挥员战士们都懂得，在战斗时，集中一切力量去压倒敌人，迫使敌人投降，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应坚决的歼

灭他们，或俘虏他们，这就是我们军队一往无前，杀敌致果的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我们军队非常宝贵的历史传统，今后应该在我们军队中大大提倡，大大发扬。但是在战斗解决以后，对待俘虏的政策，就不是这样，这里应该转变为说服态度，从思想教育上、物质待遇上、政治态度上争取他们，将我们在战斗前与战斗中对于敌军的宣传变为事实，借以瓦解敌人的队伍。拿中国的老话说，如果前一种态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么，后一种态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前一种态度应用于后一种情况，那是不对的。分别而又同时发扬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应把这一点更大的发扬起来。

如果说对敌人是用「霸道」，那么，对同志、士兵、对人民、对朋友，就是用「王道」。对前者是打击，是消灭，对后者是尊重，是说服。如果不去学会分别这两者，如果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有时稍微误用了去对待同志、士兵、人民与朋友，那就是犯了极大错误。严格地分别这两种态度正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今后同样应当予以大大发扬。

在我们军队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上，应依照部队的具体情况去规定。依照具体的需要，在一个时间内，对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有所侧重，例如，在部队政治教育特别缺乏时，应当多费时间、多费精力去着重进行政治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般地说来，在分配二者的时间上，军事教育应占的比较多些，政治教育及文化教育则应占的比较少些，不可拿许多不必要的繁琐的会议、汇报去占据军事训练的时间。许多政治教育工作与政工会议，则多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做。这种时间上的分配，决

不能被误解为是降低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恰好相反，我们认为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使人们懂得，认真的政治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轻视政治工作的观点，都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有些部队中将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及其他政治工作活动占去了太多的时间，减弱了军事训练的时间，这是应当纠正的。

在军队的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的比重上，政治教育应占第一位，文化教育则占第二位，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情绪、政治认识与政治质量。但革命军队的文化水平，是应该提高的，不能误认为只要政治，不要文化，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各种间隙与机会去进行识字运动及其他文化活动。在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情况下，文化教育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应多加些力量去做。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是以工农为其基本成分的。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从地主富农资本家阶级出身，而真心愿意献身于抗日战争，真心愿意服从共产党领导的那些人们，参加我们的军队。这些人们的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那是会有的，放任这些缺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不是排斥或歧视他们，而是欢迎他们与尊重他们，和他们一起奋斗，在奋斗过程中逐渐地帮助他们克服其缺点。

对于军队中的二流子（流氓），应和对于地方上的二流子一样，采取改造与感化的政策。听任二流子习惯存在，是不对的，单纯地排斥与洗刷二流子，也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二流子是可以经过教育，变为好人的，只要我们的政策方法不犯错误。

对于会门与土匪，也应采取逐渐地有步骤地感化与改造他们的政策，不能是单纯地排斥与打击的政策。除非我们尽了一切力量去争取，而某些会门或土匪还是坚决站在敌人方面反对我们，才可以采取某种打击手段。但在打击之后，又应继之以争取。

抗战时期，各种对敌伪斗争的政治工作，争取敌伪军俘虏的政治工作，武装工作队的政治工作，争取广大民众加入军队的政治工作，组织民兵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到军队中来的政治工作，团结地主资本家阶级和我们一道抗战的政治工作，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以及其他作得有成绩的工作，凡属有积极意义的，都应该继续坚持与加以发扬。

如果我们部队中对于上述各项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偏向，那就应当加以纠正。

此外在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同时也在军事工作中），还有几个毛病，在前面虽已提到，但是没有着重说清楚的，需要在这里说清楚。这些毛病并不是每个部队都是一样地存在与一样地严重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在去年一年中又已经给了许多的改造。但是这些毛病是这样显著与这样引人注目，使我们不得不提出来加以分析，以期唤起同志们注意，加以彻底的克服。

那些毛病呢？第一个毛病，就是形式主义，常有这样情形，当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他们的计划常是随时可用、随地可用的照例文章，他们只知道习惯了的一套老公式，不知道依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形式主义。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问题上（军事教育上也有某些相同），我们教的东西与战士们需要的东西，有些

是不相符合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战士面前专门喜欢谈论国际大势与国内大势，却不愿意谈论本地本军与本连本队的大势。把这种自己所最清楚的同时又是战士群众最需要最欢迎的具体事物，抛弃不谈，却喜欢向战士们输送大批的抽象概念。又如，有些同志常常喜欢凭空教导战士们要守纪律，要做模范，要英勇坚决，却不愿意把现成的、活的、动人的模范人物，英勇事迹，讲给战士们听。似乎这样的东西，没有讲的价值，只有大批概念，才是无价之宝。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内容既是教条主义的，教授法、学习法、测验法也是教条主义的。教的人不管被教的人懂不懂，只管教下去，为的是要「完成计划」。学的人也就只得把听课当做一种负担，当做一门差事，虚应故事，从来也不知道要联系自己与反省自己在测验的时候，只知算回答的分数，不知看实际的行动。这种情形，在许多部队中存在着。在这些部队中不但对战士的教育如此，对党员的教育也是如此，不但对政治教育如此，对文化教育也是如此。不重内容但重形式的形式主义作风，成了我们宣教工作的一个严重毛病。这种情形，就陕甘宁边区说来，一九四三年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在干部的思想，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的。

我们的有些支部工作，也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有些同志，当他们去检查支部工作，讨论支部工作的时候，当一个支部书记在布置自己工作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会议与汇报，名曰「建立会议制度」，「建立汇报制度」。会议与汇报执行得好的，就是「模范」，不好的，就不是模范，几乎把会议与汇报当做中心，当做一切。因此，支部忙于开会，党员忙于到会，结果是大家讨厌开会。为什么如此？因为这种会议是毫无内容的，枯燥无味的。战士们讨厌这种汇报，因为这种汇报大多是消极地向

战士们找岔子，反映所谓「怪话」，因此，引起群众不满，这种所谓会议与汇报，只是使支委脱离党员，党员脱离群众，象这样的支部工作，是没有法子做好的。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如果不是按照每一部队的特殊机能（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卫生队、运输队等等）及每一任务的特点（作战、训练、生产、做群众工作等等），去进行不同内容与不同形式的政治工作，而是对于什么都做成一样的政治工作，那就是一种很厉害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在若干部队中是存在的，是这些部队的政治工作所以缺乏生气的原因。

有些部队中写报告填表格的制度，也有类似的情形。例如，上级机关规定许多报告项目与表格形式，生硬地要求下级（特别是营连）去做去填。在此种要求下，下级只得拚命地做上去，填上去。但是这些东西的内容，大都千篇一律，很少实用，徒费精力。上级得了这种东西又往往堆在一起，不加分析与整理，结果化为废纸，无所用之。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我们军队中的许多组织形式是不合实际的需要的。例如，有些政治工作机关分了很多的部与科，收罗很多的人堆在机关里，结果人员越多，工作越少，忙的多是一些琐碎的形式上的工作，真正的领导工作反而做得少了。又如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政治战士，也变成了形式上好看，实际上无用的东西。

总之，凡不合实际需要，徒具形式的工作方式与组织形式，都属于这一类，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个毛病，就是平均主义。这里所说的，是指我们有些同志做工作计划时，不知道抓住中心；检

查工作时，不知道找典型；解决问题时，不知道从某一个关节着手。以至他们的许多计划，常常是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早已成了日常习惯的业务，也要列入所谓计划之内，把一些不关痛痒的东西和主要的东西同时并列在一起，这样搅在一团，毫无眉目的所谓「工作计划」，完全失去了工作计划的意义。有些部队的同志不知道，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只应该有一项为当时情况所要求的中心工作，而其他若干必不可少的工作附属之，而是同时发动做很多项工作，想在这很多项工作中获得成绩。但是其结果则是一项也做得不彻底，一项也得不到满意的成绩。我们有些同志在检查工作时，可以把所有的连队都跑一遍，把政治工作的各个项目都考查一遍。但是结果呢？仍然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分析问题，没有找出事件的症结，加以恰当的解决。所谓「总结工作经验」，变成了一句空话。这些都是很严重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工作方法，其原意是想样样做好，但其结果一样也做不好。这种平均主义方法，同形式主义一样，其性质是主观主义的，因为他是从主观臆想出发，不是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个毛病，就是重号召不重组织，以一般号召代替具体指导，换句话讲，就是空喊。我们看到有些同志提出的号召是不适当的，他们没有估计那里的工作性质，没有顾及那里的群众情绪，他们所号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部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号召是正确的，我们也看到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发出的号召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号召发出之后，第二个号召接着又来，在那里，许多工作是在号召上打圈子，永远停留在号召的阶段，许多工作常常是有头无尾的。这是对工作的开玩笑态度，极端不庄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对政治工作，对领导机关，都只会损失威信，得不到任何好结果。与此相反，我们应

该根据「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原则，一经提出号召，就应组织实行，并在实行中，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指导其余。如果没有具体指导，则所谓一般号召，就是自己给自己取消了。

第四个毛病，就是有些同志的孤立主义。不是人家孤立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这些同志，首先，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不采取群众路线，不组织群众行动，宁愿将政治工作锁在狭隘的圈子里，只有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在做，在忙，广大群众却在那里闲着。许多事是可以而且应该协同军事工作同志一起去做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找人家，宁愿使工作老是抓不开。至于动员了群众的，也有这种情形，在那里，不知道照顾群众的需要，而是违背这种需要，不知道考查群众的情绪，而是忽视群众的情绪。从而关于领导群众的艺术问题，关于如何团结积极分子，巩固中间分子，提高落后分子的问题，关于党与非常群众的联系问题，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互相配合的问题等等，都被认为是重要的，或者完全被忽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能不一般化与简单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政治工作，就变成了少数人脱离群众而孤立起来的所谓「工作」。此外，有些同志在解决问题时，不凭自己的本领，不凭自己勤于向同级、向下级、向群众去商量去学习，借以取得知识，取得经验，而只凭自己的工作职位，只凭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以至于不得不把事情弄坏，有时甚至毫无办法，只好拿大帽子压人。这种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是孤立主义的方法。

总起来说：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

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它同党的作风，革命军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我们的政治工作曾经有过很好的传统，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具体表现。过去工作中，凡是继承了并发扬了这种传统的，那里的工作就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现在在陕甘宁边区部队中，在整个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有很多生动活泼的创造。在长期抗战中，产生了很多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他们没有形式主义，也没有平均主义，没有空喊，也没有孤立主义，他们是实事求是与联系群众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应该表扬他们，应展开每一个部队中学习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们，善于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蓬蓬勃勃地活跃起来，发扬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即使在过去工作中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会在这个群众运动中改正过来。经验已给我们证明：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旦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

三、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规定

根据上述陕甘宁边区部队一年工作的总结与全军历史上的一些总结（不是全部总结），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政治工作中现存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应有某些修改，并加入许多新的东西进去，才能适合目前军队的需要。但是我在这里准备来说全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问题，只说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其他部分则待将来再讲。并应指出，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有些还是好的，应当保留的，这里所说的修改，是指那些已被长期经验证明不适合实际需要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仅具形式而无工作内容的，有些则由于情况变化，从前适用的，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大体都有基本的与临时的两种。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应固定，而应当依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在工作中，应当创造新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不当留恋已经陈旧了的东西。这里的原则是：凡属便于组织和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借以完成一定任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便应当充分利用之；如果某种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不利于组织与发扬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完成一定任务的，就不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废止，而代以新的东西。例如我们从战争中，从整训运动中，从生产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中，创造了战斗英雄会议，劳动英雄与模范学习者会议，连队军人坦白大会等，都

是很好的组织形式，应当予以发扬。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 连队中的会议制度与汇报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过去有些部队会议太多，一个连队每月有多至四五十次的，空虚繁杂，徒耗精力。今后不论是属于行政的，党务的，或政治工作的，也不论是属于党员的，非党群众的，或干部的，凡属工作性质相同，到会人相同，又不妨碍机密能够合并举行的，应当合并举行；不能合并必须单独举行的，才许单独举行。一切会议，必须是有内容的，例如充分地切实地检讨工作，教育同志，解决问题等。凡无此类具体内容的会议，一概取消。一切会议汇报，都应注意节省时间，会议次数不应过于机械的去规定。党员向组长，战士向班长的固定汇报制度，已成形式的东西，且使战士讨厌，应予取消。

(二) 连队工作网的作用，是为着对付奸细与逃兵。但是证以过去经验，依靠少数耳目与固定的网对付奸细，是不起多大作用的。防止逃兵，争取与巩固动摇分子的工作，是支部的责任，是所有党员及所有革命战士应做的工作，是属于一般的政治工作，不是防奸性质的工作。对逃亡分子的政策，主要是争取，是说服、教育、感化，是改善官兵关系，改善管理制度、改善连队的物质生活，从这些积极方面去解决问题。逃兵归队时，应取欢迎态度，使他安心，禁止轻视、讥笑与打骂。过去许多工作网用反侦察的方法对付企图逃亡的分子，是错误的，反而妨碍了争取。因此，今后连队固定的工作网无存在之必要，应予取消。只在必要时，临时布置侦察员，任务完毕，这种临时组织即行消失。

(三) 连队中的十人团，在对付逃亡，巩固部队上，起过某些作用。但是由于其工作过分注意消极防制的方面，忽视从政治上去积极争取的方面。而且这种组织只有在新兵居多数的连队，或逃亡盛行的时期，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在没有此种情况的一般连队中，无组织十人团的必要。只是在需要这种十人团的特殊情况下，才去临时组织之。

(四) 在青年占多数的连队，应当重视青年的教育工作，过去青年队组织曾起过某些教育青年的作用。但是，过去的青年队，由于不注意发挥青年群众的积极性，以与成年协同奋斗，往往使青年脱离成年而突出。又由于过于从外表上强调青年的组织生活与特殊教育，而连队中青年与成年的组织生活及各项教育，又大都是一致的，因而使青年队的工作，变成空虚与无力。今后不必有固定的青年队的组织与纪律，不必有固定的青年特殊教育，也不必有固定的青年会议生活与汇报制度，而应在连部或队部指导下，开一些非固定的青年会议，借以教育青年，启发青年的积极性，并使他们与成年一道，努力于共同工作。

(五) 连队中的政治战士，因无一定工作内容，应予取消。

(六) 在取消连队中的工作网、十人团、青年队与政治战士等固定形式之后，关于反逃亡的工作，防奸工作及青年工作，均由支部集中领导，按照实际需要，规定适当的具体办法。支部应注意利用军人俱乐部去做自己的工作，很多带群众性的工作，均应通过军人俱乐部去做。过去有些部队把军人俱乐部看成只作文化娱乐工作的机关，致使俱乐部工作内容贫乏，今后应扩充俱乐部的工作内容。

(七) 由于发展了伟大的生产运动，把连队的经济工作提到比前更加重要的地位了，因此应该重视连队经济委员会的组织及其工作。连队经济委员会应由选举产生，官长可以当选，但不超过三分之一。其职权为计划、组织与监督连队的生产、消费及防止贪污浪费等，为连队全体人员特别是为战士群众谋物质福利的一切必要事项。连队经济委员会应脱离俱乐部而独立，支部应经常注意其工作。

(八) 改变支部与连队政治工作并立的制度。支部除接受总支委领导之外，应该接受连队指导员的领导，指导员兼任支书。支部在纯粹党务问题上（如接受党员、开除与处分党员，以及处理党内纠纷等），应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得个人包办。在全连事务和政治工作方面，支部应经常与连长取得意见上的一致，并应尊重连长的意见。

(九) 根据中央决定，每年旧历正月为拥政爱民月。举行拥政爱民运动。全军应利用这个时间，在所有连队中进行拥政爱民的深刻教育。这一制度的规定及其认真实行，将使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获得极大的改善，全军都应重视这一方式。

(十) 每年举行一次至三次以教育为目的的反省坦白运动。每个连队，在一年中择一个至三个适当的机会，每次三天至五天，举行连队的反省坦白大会，根据「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在高度的同志友爱互助精神之下，使每个干部与战士均把心中的不满情绪，打骂现象，想逃亡的心理，奸细分子勾结与破坏的现象，物质困难情形，侵犯民众利益现象，不尊重党政不尊重上级现象，以及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等，一概反省出来，坦白出来，然后由连队支部及行政首长收集起来，一面反映到上

级去，一面讨论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切实办法。这种方式，现已在很多部队中证明是发动群众积极性，提高战斗情绪，提高领导威信，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消灭逃亡现象，破获奸细分子，改善各方面工作的很好方式，上级领导机关应很好地注意组织之，应在事前有各种积极准备及精神上的酝酿，使这种大会在不是勉强的，而是自然的，不是惩罚的，而是教育的，不是冷淡的，而是热烈的空气之中去进行，使这种大会成为干部与战士团结一致的真正教育性质的群众大会。如果一年中开两次至三次时，其中有一次可在拥政爱民月内举行。

(十一) 以分区以旅以团或以营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各方面模范工作者的会议(如果合开时，可以总名之曰群英大会)。各种英雄及模范工作者，应经过认真的选择与民主的选举，真正是广大群众所佩服的人物，并在选出及开会以后，经常注意培养他们。这些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中，大多数应从战士及杂务人员中选出，但须有相当一部分从初级下级及中级干部中选出来。在这种大会上，应给予优异者以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奖励，并在报纸上予以发扬，号召群众学习他们。

(十二) 恢复古田决议的党的代表会议制。分区为单位或旅团为单位全年举行一次。代表经选举产生。

(十三) 恢复古田决议的书宣组联席会议。分区或旅或团为单位每年举行一次。

(十四) 全营集合讲话，每月一次，一有可能，应举行全旅及全团的集合讲话。应重视此种集合讲话，把它当作提高战士情绪、统一全军意志的主要方式之一。此种讲话，由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负责人

共同出席。此种讲话的精神，应是鼓励多于批评（连队集合讲话亦应有此种精神）。

（十五）报告与表格的目的，是为着反映部队及其工作的发展情形，使上级能够据以了解那里的课题所在，给以适当的指导。今后应当废止那些不分析工作发展过程，不指明问题在什么地方，千篇一律，毫无内容的报告方式，提倡能够生动地反映工作发展过程，能够指明成绩所在及为什么获得此种成绩的原因，能够指明矛盾所在，困难所在，问题所在及为什么发生此种矛盾，此种困难，此种问题的原因，以及自己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困难与问题的意见这样一种报告。少作按周按月按年的报告，多作叙述事件起讫，叙述过程发展的报告。表格也要废止繁杂而不切实用的，提倡简明而切合实用的。

（十六）机关工作人员应以少而精为原则。并应改造某些机关工作中所盛行的那种「办公事」式，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不良作风。

我的这个报告，经过很久的积累，又在这次会议中经过到会同志的多次座谈，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前方来的军事工作同志与政治工作同志又提供了许多意见，并经过中央同志及西北局同志的指导，才这样地做出来。如果大家认为恰当，我们就决定照此去做。只要全军上中下各级干部的思想打通了，工作成绩是会很快看见的。在整风的精神之下，我们坚决相信，全军将有一个飞跃的进步，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决民族，解放人民的神圣任务，我们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人民日报 一九七八·八·一

○光明日报 一九七八·八·二

在职工代表等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五·二二

（本报讯）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二十二日下午在杨家岭欢宴职工代表，宴毕，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招待会，同时欢迎英国林迈可先生夫妇，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仁奎先生，及刚从敌后归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上全体职工代表向毛主席及朱总司令献旗及献词。在雷动的掌声中，毛主席出现于台前，向代表们讲话。

毛主席在略述今天招待会的意义以后，即谓：现在无论外国和中国都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们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目的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有第二个目的。边区在五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产业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到了今年就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面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均了全部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要大大的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向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都向这方面努力，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

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此时毛主席再一次的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毛主席继续称：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间，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会，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毛主席讲话毕，即由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表现敌后艰苦斗争的「把眼光放远点」等剧，甚为精采，至夜深始散会。

○解放日报 一九四四·五·二六

〈中办公厅招待会上

毛泽东同志号召发展工业打倒日寇

共产党员和革命

者应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和智识〉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四四·五·二四

（本报讯）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延安大学在边府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到各部负责同志及来宾甚多。毛主席、朱总司令均亲临参加典礼。「中略」

周杨同志报告完毕。毛主席在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中起立讲话，他首先指出现在边区教育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而这是与边区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进步有联系的。由是他说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所有我们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根据地不行。最恨我们根据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不喜欢我们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英美都喜欢，凡是我们的同盟国都喜欢，因为根据地在敌人后方把敌人挤出去，打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与百分之九十多的伪军，中国抗战的主要责任，是共产党担负起来了。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工作，要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项工作，以便给日寇以最后的打击。延安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安所要学习的，要学这一套，要做这一套。

毛主席随又着重地指出今后延大的具体任务，另召大家：在政治上要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的

方针，要学习各种政策与方法。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要帮助三十五万农民做到耕三余一，要帮助老百姓订一个植树计划，十年内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还要使边区工业做到全面自给，达到每年出产三十一万匹布，四百七十万斤铁。还有文化建设，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识一千个字，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还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个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

毛主席再三的叮咛大家：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象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毛主席随又指出 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解放日报 一九四四·五·三一〈延安大学开学 毛泽东同志指示 延安应为抗战及边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九五八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毛泽东思想万岁（下）

延安大学教育方针

一九四四·五·二四

一、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

二、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三、本校教育通过以下各种方式和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期实际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

1. 与边区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建立一定组织上或工作上的联系，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负责人，依具体情形，直接参加本校有关院系的教育工作之领导。

2. 边区建设各方面政策方针与经验总结，为本校教学之主要内容，技术课以适应边区建设当前需要为度。

3. 本校研究人员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边区建设各方面实际问题之研究，并依具体情形定期地参加

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工作。

4. 本校学员在修业期间，定期地分派到各实际工作部门进行实习。

四、本校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建设精神，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

五、本校在教学上实行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并使教学员中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交流，同时发扬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难，热烈辩论的作风，以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

○解放日报 一九四四·五·三一 〈今后教育方针为学与用一致与边区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

☆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四·六·五

(一) 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这是证明。仅在没有我党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的地方，我党才不能负此责任。

(二) 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线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一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就可

使二者互相结合，里应外合的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三) 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四) 要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必须解决下列诸项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思想：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并服从这个目标。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为了这样的目标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于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

迅速的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宽广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或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又要使干部了解：为着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艰苦而伟大的准备工作。由于中国特殊条件，城市武装起义，常常只有在响应城外进攻军队的条件下，即在里应外合条件下，才有胜利可能（例如一九二七年上海起义），而没有城外军事行动配合的单独城市起义，是很难胜利的。因此在准备城市武装起义工作中，应该反对急躁病，反对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在没有城外我军配合条件下，单独的或者过早的发动起义。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又要使干部了解：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当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需知道的事，不应该知道他们所能知道的事。

第二，关于计划与组织：各局、各委应依据自己所属地区内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与伪军伪警的具体情况，拟定一个大体计划，例如如何分工负责，如何组织机关，如何配备干部与训练干部等。应以每一个城市（大的中等的和小的）、每一段铁路公路、每一个伪军部队与伪警组织为工作对象，都

组织一个有能力的工作委员会去进行工作。大城市与大部队还可组织几个委员会分头分区去工作。此种委员会不作根据地工作，专门负责组织与指导各该城市要道与伪军中的工作。此种委员会目前可设在根据地内，或游击区内，如有安全条件，则设在城内。各局、各区党委，对所属大城市中等城市及重要铁路，应委托在自己直接指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去工作，各敌占县城及小城市，则在各地委或县委指导下组织委员会去工作。对于经常调动的伪军中的每一个军或师，应在适当党委指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去工作。但是同时这种工作还动员全党全军一切组织多头的与分路的去进行，从支部到中央局各级组织，只要它对城市与交通要道及伪军伪警有办法去进行工作者，均应直接派人去工作，暂时不必统一，关系亦不必交代，如各种关系在工作中群众中碰头时，则应彼此关照协助，不应彼此争夺和抱怨。这种工作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但为管理方便起见，在各局及区党委之下可成立城市工作部门，这种部门除指导和组织城市与交通要道秘密工作外，还应指导敌区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的小型便衣游击队，借此给城市工作以便利。这种部门应住在根据地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要与根据地党政军混在一块。

第三，关于工作方向：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大局有利于我，城市与要道周围或其不远地方，又有我党强大军队与根据地，这种工作将有极大开展的客观条件。在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人民中，除开极少数死心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外，大多数人是能够参加或同情各种各样抗日工作的，因此我们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一切群众中，各界人民中，都要进行广泛而妥善的工作。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

与流氓组织中都要去进行工作，但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不应与国民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应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人的反动腐败无能和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民族利益，肃清大城市群众中对国民党任何幻想。过去我们在大城市为情报及经济工作而建立的组织与关系，仍应进行情报与经济工作。只在可能情况下去进行一些上层活动与群众工作。为了广泛造成根据地与城市（特别大城市）和要道的交通联系，并为准备夺取城市和要道的军事出发地，应在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的人民中进行充分的工作，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第四，关于工作方法：到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方法，应从总结已有经验中取得，并应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去总结经验，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但应指出：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

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应用心研究适合每一个地区，每一种群众，当时环境中合法与非法相配合的斗争形式。在敌占区，党和抗日团体组织，只能秘密进行，因此应该注意精干隐蔽，严防特务分子混入。但各种普通群众组织与群众活动，就应该公开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形式去进行。例如利用已有各种伪组织（新民会、自卫团等），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或建立纯粹的但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职业机关与职业活动（茶馆，饭店，荐头房等）；甚至利用工厂、工房、学校、店铺，在为了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成立其中所有人员某种无定形的联盟，亦是一种很好的群众组织形式。我们常看到根据地附近乡村中全村人联盟，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的严密组织和分工，这种办法应该运用到城市某些工厂、工房、学校、店铺中去。应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群众联合起来，例如减轻负担，免除骚扰，隐藏物质，以及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均可以成为群众联合活动的出发点。而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欺骗做法，则大可成为我们和群众利用的合法口号。其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区各阶层人民中的极高威信，亦可成为我们城市工作的有利资本，许多人以听到我军消息，与我军建立某种联系，取得我军某种证件为荣耀者，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形去促进人民的团结，但这在敌占区是非法的，应该十分隐蔽的有限度的去利用。在目前，城市和要道的一切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以不妨碍和破坏我们的合法组织和合法斗争为限度。这点与根据地附近游击区中的合法与非法联系的斗争是有些区别的，在游击区中的合法斗争，常常是为了掩护非法游击队的活动和存在，而在

城市与交通要道则相反，非法斗争常常应该服从合法斗争。在敌区的宣传工作，亦应采用许多合法形式去进行，利用各种合法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并利用各种合法口号去进行。各种非法宣传，也是应该进行的，但应切实考虑其方法。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正确方法，是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內，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而使精干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隐藏在群众的合法活动之中。而在举行起义以前，一切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均应避免定型的与系统的形式，采用各种不定型的与分散的方式，以期多得胜利，减少损害。

第五，关于干部：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但应使他们吸收新经验，并在新方针下，用新方法去工作。其次，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的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一些出来，加以短期训练派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种职业者，

或党与非党干部均可。而这种干部，现在各根据地是很多的。再次，就是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做工，谋事，特别是在苏北与胶东，每年有数十万人到上海、杭州及满洲各城市谋生。因此，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干部。此外，在伪军俘虏中亦可训练一些干部放回去。根据地士绅到城市居住者，亦可给他以某种任务和名义到城市去活动。就是根据地中因有某种政治嫌疑而不易弄清楚者，亦可派他们到敌占城市进行某种独立活动来考察他。而在各种干部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地干部，外去干部应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的引路者与保育者。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总之，我们应放手使用各种各样干部去进行各种各样工作，并使各种人的各种工作都分开进行，不混杂在一起，多头的与分路的去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在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上建立起党的多数可靠据点，作为伟大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此外，在根据地中，各级党政军民的负责干部，均应切实研究与学习城市工作，研究城市的武装起义及里应外合的斗争艺术，研究建立城市革命秩序，掌管城市及大的工商业，作为将来夺取与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

第六，关于经费：必须有大批经费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只要不引起干部的浪费及城市工作人员的雇佣观念，一切必需的经费，是应该充分付给的。各根据地各种组织，为了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必需开支，应准予报销，在各根据地预算中，应准备一笔充足的城市工作经费。发给资本到城市与要道去做生意，以其盈利充工作经费的办法，也是可以采用的。

(五) 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 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一一

准备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

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讨论的各项问题

一九四四·六·二四

六月二十四日

至西北局谈话。

改写联席会决定。

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决定：

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国军后退，全国危极，西北危极。为要团结力量，生长力量，克服危机，准备反攻，决定本年十一月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

这次大会上主要的将讨论：

一 团结与民主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但这些成绩还不够大，还有缺点，我们要检讨已有的和不够的经验，多反映各方意见，给团结与民主以更充实的内容。党政军民男女老少一齐动员，准备力量。且要以我们的模范，推动全国从速终止一切分裂与反民主的现象。

准备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讨论的各项问题

边区建设问题。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疾病。我们与贫穷斗，消灭贫穷现象了。但为着备荒、备战，过更丰裕的生活，必要于短时期内做到边区三十五万户，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至少有一头牛，至少能植活一百棵树。边区工业品要能自给，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我们与愚昧斗，进度虽快，但文化还异常低。要用一切有效办法，使男女老少至少都能认到一千字。我们与疾病斗，成绩还差，财旺人不旺——传染病、娃娃不好活、柳拐子……等，为人民最大痛苦。要用极大力量，很快做到每乡能有一个医生，每区能有一药店，县城及大的市镇能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或卫生所。开展卫生运动，从速消灭喝坏水（要打井、窖水煮开）、人畜同居、不会接生等极恶劣的不卫生现象。

武装民众问题。正规部队要有广大的人民武装做后盾；能保卫家乡才能保卫民族。我们要把民兵搞得更好，普遍地制备与练习使用手榴弹、地雷、洋枪、土枪及其他武器。大家一条心；平时务生产，打仗都是兵。拥军搞得更美，帮助抗属搞家务，帮助退伍残废军人成家立业，使军与民更加一体，更能提高其战斗力。

上列工作，我们正在做且做得有成绩。人民起来了，对敌仇恨增高，对自己的某些落后不能忍受（如不识字、不卫生等），好的办法日在创造。他们要求有一明确的奋斗的具体指程。本联席会责成各主管部门连将上列提案的提纲制出，送交各边区参议员、各级参议会政府、劳动英雄们、各抗日团体讨论，搜集各个工作的具体经验和办法，及在各个地区的特殊情状及其完成需要的时间，报告边府汇集，使提出大会的案子能更详备。

边区参议会将于明年改选，为使更能把人民爱戴的人选到议会，更能反映与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关于选举条例及选举方式也将提出大会讨论。

距大会只有几个月了，须加紧大会准备工作。

录毛改稿。

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战场后退，全国危极，西北危极。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为团结一切力量准备对敌反攻，决定本年十一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主要的将讨论下列各项问题：

(一) 团结与民主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今年的参议会应检讨已有的和不够的经验，反映各方意见，给团结与民主以更充实的内容，使各界人民男女老少一齐动员增加力量，且要以边区的模范推动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从速终止一切分裂与反民主的现象。

(二) 军事问题。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兵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须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检讨此种工作。

(三) 边区经济建设问题。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几年以来，全体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与贫穷现象斗争。这种现象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已经减轻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的改善，丰衣足食的新现象已日渐推广。但是，还没有普遍，更因抗战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两年至三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边区各项工业年有增加，但还不能自给，特别是布、铁等项要办到三年内完全自给，并且不仅求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好。在与愚昧斗争事业上，年来虽有进步，但文盲

还未消灭。要用一切有效方法，使男女老少在数年内至少都能认到一千个字。在与疾病斗争的事业上，更须作极大努力，方能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应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亦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的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四）选举问题。边区参议会应于明年改造，为使人民更能把自己爱戴的人选到参议会去，使这些新的参议员更能反映人民利益与决定抗战建国大计，关于选举条例及选举方式应在今年参议会上提出讨论。

上述四项为今年参议会必须讨论之主要问题。本联席会议责成各级政府、各参议员及各级参议会、各抗日团体、各劳动英雄在事先发动热烈的讨论、准备意见，以便届时反映于参议会，作出有利于增强团结抗战与发展边区各项建设之决议。

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

一九四四·九·五

昨天本报公布边区政府关于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指出选举与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重要意义，对选举奖励的办法也有详尽和具体的规定。在今年冬天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及今后边区全面建设事业中，必将起重大作用。这是一项新的组织形式与新的工作方法的定型化，合法化，值得引起大家注意。

陕甘宁边区自从党政号召生产运动及各种建设事业以来，随着这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从群众运动中产生，又站在运动前列，把运动推向前进，成为边区各种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动力。可是过去我们对此还缺乏自觉的认识，甚至是盲目的，因此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缺少注意和发现，任其自生自长，无声无名，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自从发现了吴满有和赵占魁并进行吴满有与赵占魁运动以后，经过去年冬天的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才被我们逐渐认识，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拔，也逐渐推广，一年多的经验向我们证明：在各种生产建设事业发展中，到处有劳动英雄和模

范工作者存在着和生长着，只要我们有意意识的去发现，发现后加以奖励，广为宣传，使其影响深入群众，号召群众向其学习，则其在群众生产建设运动中就可发生很大的作用，从而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奖励，是目前边区全面建设事业中一项极重要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这种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是由群众创造的，现在我们把它接受起来，定为今后发展生产建设运动的重要方法。

选举和奖励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首先是为了推动和改进工作，因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创造了超出一般人的劳动标准和工作标准，这种标准，既然在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是可能的，则对于所有的劳动人民与工作人员，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应当是可能的，而他们所以还未能达到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必然在其生产或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如果我们能把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及其条件和办法，在一般群众及工作人员中加以宣传和表扬，则不但可以刺激其积极性，而且可以在互相对照之下，发现其缺点，并进一步以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做为自己努力的标准，以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经验，做为自己改进工作的办法，使其生产或工作提高一步，使更多的人向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看齐，使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更加普遍化。一年以来，不论是在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只要那里在群众中产生了一个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经过我们发现，把他奖励宣传，号召大家学习，则那里的生产和工作，就会得到改进提高和发展，证明这是推动和改进工作普遍可以采用并且是最好的办法。

其次，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和奖励，又是出产和培养干部的一种好方法，因为他们真正是从

群众中和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并在事实上证明了是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努力生产或工作，在生产或工作中获得了成绩，表现出他们的创造才能，并且这些人大都为人正派，又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对政治也有较高的认识，这些都是做为一个干部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能有计划的下一番功夫去培养他们，提高其文化，加强其教育，则他们的优良品质和创造才能，将会更大更快的发扬。现在有些地方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已开始被引进到各种工作部门中来，逐渐成为各种事业中的重要干部了。过去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这些干部至今还是我们边区的骨干，但在今天边区长期的全面的建设环境中，仅仅是这些老干部就非常不够的了，如果我们不能引进一批新的干部到我们的各项建设和各种组织中来，则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不会顺利完成，而这一批新的干部的增进，不在别的地方，恰好就在这些建设事业的本身，就在广大的群众当中，就是由各种建设事业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党政军民各种组织的领导者，必须深刻了解这点，并对此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

再次，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党政军民一体来进行边区全面建设的事业中，还有一种巨大的作用，就是它能成为党政领导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桥梁，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散布在各个角落和各个部门，他们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着，但他们不是一个普通的群众，而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自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群众的领袖，党和政府经过他们，可以把群众的意见集中，来改善自己的领导，又可以经过他们，把党政的方针指示在群众中传开，并推进其实现，这样使党政与群众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今年的生产运动及其他建设工作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出了这点，许多劳动英雄回到他们的乡村，

宣传党政军生产建设方针，积极推动和组织群众生产，很自然的成为党和政府和军队各种政策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据说凡是有了劳动英雄的乡村，乡村党政的工作，就好像增加了许多力量，比过去好做得多了。

以上三点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客观上所起的主要作用，这些客观作用一旦被我们自觉的认识并掌握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改进工作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最好的方法，就成为我们当前各种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而我们只有清楚的认识到这些，才能把今年全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奖励工作做得更好，因此这是首先应在全体党政军民干部中进行广泛宣传和教育的。

要把选举和奖励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工作做好，除了上述思想认识问题外，还必须进行很繁杂的组织工作，在组织工作上主要的应保证实现下列三条：

第一、是认真领导。去年劳动英雄的选拔，有些地方是不认真办的，事前毫无准备，临时随便指定劳动英雄，未经群众讨论和选举，今年选举则必须完全纠正这种缺点。所有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从现在起就要很好的讨论边府决定，并在所属范围内开始布置工作，包括关于这一工作的传达和宣传，关于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各地各部门具体标准的讨论和规定，关于劳动成绩调查和工作考绩，以及在选举工作中各种工作的筹备与分工等，并于适当时候进行检查，发现缺点，即时纠正，防止对此事采取应付马虎态度。

第二、是发动群众。去年劳动英雄的选拔，许多地方没有经过群众讨论选举，而是单纯由上面发现

后指定的，今年则必须按照政府决定认真的由群众民主选举，必须及早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酝酿，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选举，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真正成为群众自觉运动，防止发生形式主义的毛病。

第三、是慎选好入。去年劳动英雄的选拔，有些人是不合标准的，结果非但不能起劳动英雄的积极作用，反而在群众中发生不良影响，失掉选举劳动英雄的意义，这是在今年选举中应加严重注意的。为防止这种缺点，必须把边府规定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广为宣传，由党政协同群众共同提出候选人，每一候选人都应根据标准由群众加以审查，并应经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只有经过群众认真的民主的选举，才是真正好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也只有真正好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才能在群众中发生积极作用，达到改进工作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的目的。

以上所述各点，不但适用于陕甘宁边区，也适用于敌后各根据地。但敌后必须以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重，并且战斗英雄与民兵英雄还应放在前列，这是自明的道理。在敌后的中心口号是战斗与生产相配合，部队中的战斗英雄与民兵中的民兵英雄之选举与奖励，是应和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选举与奖励同时进行的。敌后各地对此种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有些经验还不多，有些还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迅速采用，以利发展战斗与发展各项建设工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解放日报 一九四四·九·五 〈社论〉

电贺罗斯福当选连任

一九四四·一一·一〇

（新华社延安十日电）罗斯福总统当选连任，毛主席特驰电祝贺，原电如下：

罗斯福总统阁下：获悉阁下连任总统，谨致祝贺之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解放日报 一九四四·一一·一〇 〈毛主席电贺罗斯福当选连任〉

同包瑞德的会谈

一九四四·一二·八

「前略」我在十二月八日下午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谈时，我尽了我最大的力量。

同这两位共产党领袖的会谈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次经历。我一离开主席的住所后，把刚才同他们会谈的内容趁记忆犹新的时候，仔细地追记下来。我把报告写好之后呈交魏德迈将军，因我是在他的管辖之下，我没有权直接同赫利大使通信。我的报告全文收录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一九四四年，中国」，第七二七页。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延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 题目：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谈

1.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时，我首先发言。我说，我已经获悉周恩来将军无意返回重庆。毛主席回答说，周将军到那里去无事可干了。之后，我们就当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进行了充分而坦率的讨论。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谈话要点综述如下：

「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那三条建议的主要点是，共产党的部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的军队裁减到任何数目。此后，我们就将处于听任他摆布的地位。」

「这不啻是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但是，这个委员职位是毫无意义的。冯玉祥将军和李济深将军当年都是显赫的将领，他们也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可言。实际上，整个军事委员会已经长期没有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席位，我们将能看到一切军事报告，从而可以获悉政府的各项措施，而且我们亦将处于影响政府决策的地位。我们谨此表示难于苟同赫尔利将军的意见。我们明确告诉他，虽有一位共产党人参与全国军事委员会，但他对该会的工作的了解绝不会比局外人多，而且他在该会也不可能比局外人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深知我们谈到的那种情况。」

「赫尔利将军还说，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席位，将使我们『有一只脚进了大门』，以此作为起点，将使我们的地位的重要性扩大，从而加强我们的影响，以达到如下之程度：最终我们将控制整个政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根本错误的概念。但是，我们未能说服赫尔利将军相信这是错误概念。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乃是，如果双手被反捆着，『有一只脚进了大门』是毫无意义。」

「赫尔利将军、魏德迈将军以及麦克卢尔将军曾对周恩来将军说，美国渴望在军事上同我们合作，但是，在我们能够给予这一合作——这是我们非常乐于提供的——之前，我们必须先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然而，美国并没有向我们提供在这些条件下有关我们安全的绝对保证。我们感到我们不能合乎体统地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这类保证。实实在在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不能相信美国能够对我们的安全给予保证，不论她可能是何等诚挚地渴望这样做。我们不可能信任这位委员长具有良好的信义。任何人只要没

有偏见地研究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历史，都会通情达理地想到我们不会对他寄予任何信任。

「我们发现美国的态度有点令人迷惑不解。赫尔利将军来延安时询问我们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于是，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内容是建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那些条件显然是很公平的，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他的建议下提出的。但那个委员长却拒绝了这些条件。现在美国又那么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我们牺牲我们自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于理解的。」

「我们还被告知说，我们牺牲自己以挽救局势，那是高尚的事情。但我们看不出，我们把自己置于听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时，又何以能有助于挽救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还说，如果我们让步了，我们将赢得世界上的赞扬。但是，如果我们听任这个委员长捆住我们的手脚，世界上的赞扬是帮不了我们什么忙的。」

「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我们武器，他就能派美军军官来帮助我们练兵，并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衷心欢迎这类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如下代价，即委员长要求我们接受这种援助时，须经他点头批准。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下列事实：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唯一的自卫手段——我们的军队，我们就不得不屈从那位委员长所能够、并将要强加给我们的各种限制；如果到了这个田地，我们简直就没有什么可以同你们合作的手段了。」

「毫无疑问，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但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就不给我们参加政府

的机会。我们重复说一遍，如果双手被反捆着，一只脚进了大门是没有用处的。

「要求我们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在很大程度上应对当前危机负责的那个委员长却不被要求作点牺牲，这看来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承认我党的合法性没有任何牺牲可言；我们也不能认为在那无济于事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给我们一个席位是一种牺牲。」

「无论魏德迈将军可能是何等真诚地渴望给我们援助，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委员长的条件，他就不能够援助我们了。我们希望在同日本人作战中和美国合作，我们希望在当前危急的形势下也伸出我们援助的手，而我们也需要美国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援助。但是，全盘工作都被这个委员长所妨碍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合理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我们接受美国的援助当不会成为问题。但是，我们的条件竟被这个委员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而且他还妄图要把责任推到我们肩上。」

「美国认为蒋介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保留其执政。我们并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乐于赞成他继续当领导。然而，我们也并不打算放弃在全国军事委员会应分配给我们的那个席位的权利。」

「如果看看蒋介石的过去，美国希望继续支撑那腐朽的框架——蒋介石，那是美国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够做她所要做的一切事情，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难到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实现他的各项建议时蒋介石将会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吗？当然他是办不到的。史迪威将军已经知道在军事行动中可以依靠蒋介石的程度有多大。且看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吧，直到他把昆明、贵阳、重庆、

西安、成都等都丢光，到那时也许她才会认清，支持他是完全无用的。

「我们不象蒋介石。并不是必需其他国家的支持才活得下去。我们能够顶天立地，象一切自由的人民一样行动自如。」

「虽然这个委员长有许多缺点和短处，我们认为他还没有同日本人谈和。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不过话说得回来，唯有乌龟王八蛋才会拒绝同日本作战的。」

「根据『五点建议』，我们相信，在美国的帮助下，对于挽救当前的形势，我们还能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们愿意在同日本的战斗中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相信，魏德迈将军知道我们能够作出什么帮助，如果我们得到允许的话。但是，我们不能被捆着手去打仗。我们完全愿意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政府的指挥，如果我们在这个政府内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席位将不会让我们有发言权的。」

「如果美国同我们分手，我们固然感到很遗憾，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我们将在任何时候、在目前或在将来，抱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援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同美国将领的指挥合作，万众一心，尽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对你们所怀有的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的海岸登陆，我们就在那里接应你们，并且同你们的指挥合作。」

「我们已经迎来了美国陆军观察组，而且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同他们合作。如果这个组继续留在延安，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撤离，我们将感到惋惜。如果他们撤离之后再回来，我们将再次欢迎

他们。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枝枪，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打击日本人，而且我们也仍然是美国的朋友。

「我们在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下已经同日本人战斗了七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如果美国不援助我们，还有英国和苏联会援助我们。（包瑞德按：我说明，根据我个人的意见，他们不可能指望英国会给他们很大的援助；他们对此没有作答。我没有就苏联的情况发表我的意见。）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并没有向赫尔利将军交待清楚，那『五点建议』就是我们的最后答复。上校又说，他认为赫尔利将军把那五点看作是我们的『讨价』。而那五点就是我们的最后条件，其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所要作的一切让步。我们在同意接受那个委员长为领袖时作了让步；我们在同意让我们的军队接受统一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时作了让步，我们还在美援助物资分配方面让了步，我们只是要求获得公平的份额，不能一无所得；此外我们并没有要求别的东西。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了。

「我们完全知道，赫尔利将军不能担保那个委员会接受『五点建议』。我们知道，他仅说过以下的话：那些条件是公平的，他将尽他最大的努力使那个委员长接受那些条件。但是，蒋介石拒绝了这些公平的条件后，我们并不期望赫尔利将军再来延安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同意需要我们作牺牲的建议。

「如果美国不能理解我们就一旦接受了蒋介石的绝对控制时我们将遭到的处境的预料，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全都白费力气了。周恩来将军在重庆时，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向赫尔利将军说明这一点。如果赫尔利将军到现在还不理解，恐怕他永远不会理解了。周将军再去重庆把这些问题同他重谈一遍也将不会

起作用的。

「由于蒋介石已经拒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而我们又决心不再让步，所以我们也已经下定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下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织代表各该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不过我们也不指望将会获准。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将是组织另一个政府的初步措施。」

「周将军在重庆的时候，没有把拟议组织这种联合委员会的计划告知赫尔利将军。这一措施经过长时期的考虑，不过在周将军返回延安之前，他没有获悉这一措施已经肯定下来了。」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现在采取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上。是的，我们已经把门关上了，但我们让窗户开得大大的。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将乐于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丢光了，我们就将不会按照我们早些时候提出的那些条件去参加了。」

2. 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难以对付。但他对我还没有失礼之处，虽然他有好几次大发雷霆。他连连高喊：「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让步了！」「那个蒋介石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骂他一顿！」我说到我认为委员长把那「五点建议」看作是逼他下台的手段时，引起毛主席特别愤慨，他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恩来将军不急不躁，泰然自若，他以冷静的言谈支持补充毛主席的话。这次会谈结束时，我怀着如下的感想：我同这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的谈话是徒劳的，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立场所具有的力量。

3. 在会谈过程中，我提出了几点我个人的意见，我想努力影响这两位共产党领袖的不妥协的立场。兹将我的意见和回答综述如下：

(1) 意见：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从而导致另立政府的决定，将会给予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宣称，他历来说的共产党是叛乱分子的说法，无庸置辩地得到了证实。

回答：他一直在叫嚷我们是叛乱分子，叫嚷的时间之长已使我们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怎么说好了。

(2) 意见：你们将给委员长一个机会，让他说你们同日本人勾结。

回答：他早就这样多次诬蔑我们了。我们继续抗日将证明我们绝无其事。

(3) 意见：谈判已经失败和你们将同国府破裂的消息会使日本兴高采烈。

回答：不论我们干什么，日本总是歪曲事实以达到她的目的。我们必需那样做，他们兴高采烈又何妨。

(4) 意见：如果你们同国民党破裂，不仅是蒋介石，而且大部分美国的舆论可能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

回答：时间将会向美国人民证实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

(5) 意见：你们在这次危机中未能参加政府可能在美国引起非常不利的反应。

回答：当事实真相大白，将来真相总会大白的，美国人民将会赏扬我们的行动。

(6) 意见：如果日本人被国民党和美国的部队赶出昆明和贵阳，你们将会显得非常难堪。

回答：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们比任何人都要高兴地欢呼。

(7) 意见：委员长打了败仗，而你们在他需要的时刻又不给他任何援助，美国就可能从中国撤走她的全体部队。

回答：美国不可能置中国于不顾。

到以上的报告激烈会谈结束时，毛主席已经大大地冷静下来了，但他还给我加了一招；他以颇为冷静但相当强调的口气说：「上校，你大概还记得，十一月十日在赫尔利将军即将动身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在那份由我们起草并按他的建议作了某些修改的条款上签了字；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同国民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是他建议我们签字以示我们经考虑认为这些条款是公平的。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份文件连同签字向中外报纸公布的时机总会到来的，虽然我们非常不高兴这样做。」

我没有在我呈交给魏德迈将军的会谈报告中记载毛在临别时的这一招，不过，我在从延安返抵重庆的那天向他和大使念这份报告时，口头谈到了这件事。

正如以上所记述的，在我表示如下的意见即毛主席提出同国府解决问题的条件可能显示他想逼委员长下台时，他勃然大怒；当时我感到我不得不提醒毛，我不是蒋介石，我仅仅是美国陆军的一名上校。当赫尔利大使听到毛已经暗示有可能要把签过字的共产党条款的文本向报界公开时，我有一阵子真怕他会急得血管破裂了。「妈呀——」，他大嚷了一声，用了当时难得听到而现在倒比较普通的措词，「他要了我一手呀！」这时，我只得壮壮肚子，提醒这位将军，我不是毛泽东。

说到毛主席已经「要了我一手」，在我看来，如果真有人干某项事情时，明知故犯，而且充分了解自己的行动关系重大，那么这个人就是赫尔利将军。在延安的那天上午，正是他建议他和主席在共产党提出的那些条款上签字。

关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我在延安同毛的会谈，还有最后一句话。当我离开时，他以纯粹中国的方式送我到门口。我们分手时，他说：「上校，你是真正在中国为和平而呼吁，难道你不是吗？」实际情况是我为和平而呼吁。

○人物 二期 一九八三·八 包瑞德(曾越麟译)〈难对付的谈判者〉

关于劳动英雄的讲话

一九四五·一

劳动英雄三大作用

(一) 带头作用，把生产和工作标准提高了，做出一个榜样，群众向你们看齐。(二) 骨干作用，人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你们团结了群众，开展生产和各种工作。(三) 劳动英雄是桥梁，起带上来；传下去的作用。群众的经验和意见，你们带上来；你们又到上面来开会，大会讨论的东西，如果你们认为对，就带回去告诉群众。

不要骄傲，改掉毛病

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就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在去年的劳动英雄大会上，曾经讲过「洗脸」和「扫地」，劳动英雄最好天天打扫灰尘，灰尘就是毛病，希望大家都注意改毛病，努力学习自己没有学到的东西，年年当劳动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六
△群英会报 一九四五·一·一一 〈毛主席报告〉

时局及其他问题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在党校演讲——

同志们：

今天这个会是五部六部发起的，五部六部的同志们以及还有许多同志们到延安很久了，有些来了两三年，我一次话也没有讲，我做的不对。今天就是专为五部六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中外还有许多同志参加，许多同志要求看见中央同志，要求看见从前方回来的同志，今天有许多同志都到了，将来我们还要请他们讲话，很快就要开七大了，很忙，七大之后，就有了功夫跟同志们讲。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过去没有能够尽到职务。（笑声）以后我们应该多来讲。

今天讲的题目也是同志们出给我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问题。

大家关心时局，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几个大国家是不是能够团结到底消灭敌人——法西斯。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是不是能够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头一个问题，有些报纸上，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美国、英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这个团结要破坏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呢？有纠纷的，（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还会有，所有一切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得到相互同意的，能够和气解决的；也有一部分问题还要经过很长时间，要拖一下，有些争论。法西斯国家的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就希望三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就是反苏反共的人，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打倒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苏联，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么这个问题的情形到底怎样？我可以说明，摩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是统治的地位。这几个大国从订立了条约，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有些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什么理由？这个理由在现在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打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十个师，苏联出了二百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比如欧洲第二战场拿出这八个师，也没有意大利战场，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英美两国人民的觉悟，也比过去不同了，现在觉悟起来了。参加过看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

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在座也有这样的人就看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这个国家那个时候的政府——北洋政府就参加了第一次大战，那个时候全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怎样？那比现在就差的多，英美两国人民的觉悟，欧洲人民的觉悟，中国人民的觉悟，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比如共产党就没有，只有一个国家有，就是俄国有共产党，那个时候不叫共产党，叫作社会民主党。此外布尔什维克的党，其他国家都没有，只有少数的个别的人，比如德国有一部分，其他国家如法国，也多多少少有少数的人或小组活动，他们是与列宁、斯大林意见相同的，其他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人的政党的意见都是与列宁、斯大林意见不相同的。他们维护那次战争，因为那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反动战争，所以列宁反对那一次战争。各国无产阶级拥护那次战争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无产阶级觉悟程度怎么样，就是说觉悟程度很低，无产阶级尚且如此，其他劳动人民或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我们中国那时候怎么样呢？我讲同志们今天你们很幸福，我们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所给我们的知识很少很少，什么叫帝国主义也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马克思，好象也没有，（笑声）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讲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这几年中，中国人民就在那么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至于一九一四年之前更不用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比如总司令、董老、边区政府的林主席、吴玉章同志、徐特立同志，他们这些老同志都参加过。那个时候幼稚的很，有没有党校？（笑声），那就没有（笑声），象我们这样的党校那里会有？有没有共产党？没有！影子都没有。有没有红军八路军？没有！一切都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中国没有，英国没有，美国没有，法国没有，德国没有，各国都

没有，只有俄国。但是俄国虽有，为数也很少。一九一四年开战，打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只有几万人，只有几万个党员。从一九一七年到今年，三十年当中，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现在共产党有多大呢？有一百多万党员。三十年以前，俄国只有几万党员，还是受压迫的，还没有胜利，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才胜利。从此在世界上就区别为两个时代，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以后。到一九一七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上流行了七十四年了，但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十月革命头一天爆发，第二天中国人民就知道了，你们看只有两天，七十四年不知道，两天就知道了（笑声），同志们这就是行动，行动比较言语，比较文章走得快，当然没有言语没有文章也是没有行动，十月革命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七十四年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结果。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主义的党派才发生，在那年以前，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没有，从一九二一年到今年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起了变化，而且变得很快，这二十四年比较起我们古代的历史，超过了二千四百年或者比二千四百年还多些，三千年四千年都超过了，现在中国人民提高了，我看这是很好的。欧洲人民，特别是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提高了，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他们参加这样的大战需要这样大的精力，他们的觉悟就提高了，并且还继续提高，现在一个月就抵得历史时代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讲打到柏林，比如讲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使英美的人民觉悟了，欧洲人民觉悟了。我们东方中国人民也觉悟起来了，觉悟提高了，因为人民一致要求打倒法西斯的结果，各

国政府就不得不起来打倒法西斯，那一般反动派英国、美国、中国都有。他们反对联合苏联，但是广大人民不赞成，他就没有办法，比如美国的选举，孤立派就吃了亏，美国无产阶级有很大的工会，几个月以前，美国选举总统，因为工人帮忙，罗斯福还当选了，美国有许多孤立派的分子反对与苏联合作。因为工人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就倒下来了。我们中国人民的觉悟使得蒋介石法西斯国民党（国民党里头的法西斯派别，法西斯集团）专门反苏反共集团的东西拿不出来了，他们拿一个东西抛出去，比如抛出去一个东西叫做反对共产党但底下没有人拍掌，不象你们一样大家要求要见中央的同志，要见从前方回来的同志，你们不要看国民党法西斯抛出来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是反苏反共的东西。比如前年，在座的有许多同志参加了这个斗争，七月、八月、九月三个月中，国民党宣布要解散共产党，他们说共产国际都解散了，你们为什么不解散？你们不解散干什么？又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要你们等等，把这些口号拿出来，老百姓怎么样呢？老百姓没有一个拍掌，就是说大家都说你那个东西我们不要看！（笑声）因此我们「委员长」就赶快收起了，他拿出来的时候说：「咳！你们看不看？大家就说：不要看！不要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收起的。同志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对不对？那是对的。假使这次全国人民在蒋介石拿过东西来的时候也要看，看了就说：「对！打延安！」那情况就不同了。三次反共高潮，你们都是经过的，都是这样的情形打平下去的，延安能够开这样大的党校，就是因为在我们手里拿着枪！所以第一是力量，不然还能开成吗？开不成。但是没有全国人民拥护我们党校还开得成吗？也开不成。单是拿着枪也开不成，那就是胡宗南在这个

地方开党校，也是中央党校，但我这个校长就当不成。（笑声）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三个国家团结，三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有觉悟，这一条给全世界人民很大的利益。现在保障了能够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打日本要打到那一年终止呢？这个问题也说一说。现在美国把菲律宾占到了，占了怎么样，会在中国海岸登陆，是不是会在几个月之后日本就会倒，我说看样子几个月还不会倒，今年也还不会倒，明年还要再看。总之日本法西斯现在手里还有东西，他现在有一点照我们的办法：「敌进我退」，不和美国人打硬仗留下本钱慢慢打，他就是这么一个计策，日本想美国是不想打长期仗了的，他打个两三年三四年他就想回家，我就把本钱拿在手里」。他用这个办法打，打游击战也是日本的主意。

我们中国差不多被日本爬满了，到处都有，要请他出去，他不走还是要我们把他们打出去，要靠我们党校的同志们在毕业之后到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根据地坚持工作，才能把他打出去，我们现在小米也不足，步枪不足，机关枪也不足，军队还不够，根据地还不大，我们还要增加小米、大米，增加步枪机关枪，增加军队，扩大解放区。总而言之，同志们现在上了一点年纪的人，二十几或三十几，你们都有这个学问，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个力量，你不去搬他，他就不动，只有一个原则，比如这个桌子，我不搬他，他不走，这个茶壶，我不请他，他不起来。（大笑）他的脾气还有点傲（大笑）。日本人也是这样，是要我们请他走他才走的。所以我们要步枪、机关枪，将来还要有飞机大炮，他们才会走的。我们的军队增加的很快，早一个时候，还只有六十多万现在已超过七十万了。我们解放区也扩大的很快，

生产运动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发展了，但是还不够，还很不够。城市工作尤其不够，各个区域的工作也不够，我们边区也不够，我们需要准备力量，正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小，他才不走，所以我们要准备力量，他不是一年或几个月就可以走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团结起来？要请日本走。中国的这两堆子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共产党就是小米、大米、机关枪，八路军、新四军这一套。委员长的兵力更多，有中央军、杂牌军等等，这两堆子能不能团结起来一致打日本人？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不讲不行，他如果说：「我不要团结起来！」那讲不下去，但是他心里恨我们很得要死。我这个话也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为什么说他对我们恨得要死呢？因为他亲自和我们的同志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能够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的。」死了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叫做「死不瞑目」。这是他讲的如果是我造谣，大家可以调查。（笑声）还是脑子里想的东西，但嘴上却挂招牌，要团结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又和他谈判。看样子国民党他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他说要解决问题要照他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那个政府里去的，去他一两个人到重庆去吃大米。（笑声）他说延安比较差一些，我重庆大米比较好，（笑声）你们来吃吧！（笑声）我们就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样禁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笑声）。第二样，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又不行。第三样，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说这要看合的怎么样，因为在特务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的法。第四样，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

（笑声）第五样，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那些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样，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他一个也不放。我们说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杨虎城放出来吧！叶挺放出来吧！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一个也不放，我们是「一个不杀」他就学了我们这一条，「一个不放。」（笑声）。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也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力，日本人到处窜进来了，在华北华中你把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去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与民选政府这是应该承认的。这个东西也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解散五分之四，留下四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不晓得日本人那天和他谈过，（笑声）讲得这样清楚。（大笑）八条他一条都不办，就是要我们去吃大米（笑声）我说小米也很好，要你办八条，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况怎么样，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时局问题就讲这点；国际时局，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关系，总而言之，同志们！靠我们在座的同志，靠我们在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做工作的同志们，靠中国人民多搞小米大米，多搞步枪，机关枪，多搞军队扩大解放区，在日本的地方组织秘密队伍，在国民党的地方发展民主运动，作这事就靠得住。其他的什么事情，比如英美苏三国团结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讲靠得住，很靠得住。十分靠得住，一百分靠得住，一百分靠得住，单是新四军八路军共产党，没有小米靠得住吗？我说这只有一个条件，其他也都是条件，条件之一是力量扩大。单是有这个东西，如果不增加力量，还是有限的。我们在党校准

备什么力量？我讲好好学习就是增加力量。

二、山头主义问题：现在大家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就是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东西，起他一个名字叫做山头主义。所谓世界就是中国就是共产党，我们这个党有很多部分合起来的，所谓山头不是那个人从他母亲生下来那一天，他母亲就告诉他说：你将来长大了，要去立山头，这是中国这个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中国这个社会不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因为受压迫就要革命，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运动，举出一个先锋队来叫做共产党，这个党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交通不方便，大革命的时期因为我们在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地方工作，交通很方便，山头很少。内战时期被敌人割断了，分为一个白区一个苏区，白区有这个省那个省，苏区有这个苏区那个苏区，时间很长上十年之久，抗战时期也是这样时间很长，八年之久，也是这个根据地，那个根据地，我们中国是出豆付的，外国人不吃豆付。我们中国可多得很，照割豆付的方法割了很多块子，方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象这样的党校内战时没有办过，西北、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全国各处大概除了内蒙古和西藏都有（蒙古、西藏个把子恐怕也有）在我们这里学习的。但是，我们根据地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在乡村里头就说这不是整队的，而是麻雀阵，满天麻雀，老百姓如吴满有，住在延安柳林区，这里有一个吴满有，那里有一个张满有，又有一个李满有，一家一家分得很散，叫个体经济，农村个体经济都被敌人划成豆付块子，这些革命党革命军队，团结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的很有理由的，可以打倒。这就形成各种班

子，各种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社会的产物，这是中国革命特别情形的产物，要消灭各个东西，将来要起变化。不但是我们开党校来分析来讲清楚，而且要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了，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到处有无线电收音机，开会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东西，就是说有这个东西。我们党校讨论，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提议各个机关去开会，曾经在以前以后奋斗的各个根据地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去开会，检讨历史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还是说我山头太少现在要增加它几十个呢？我们现在来承认山头主义其目的是什么呢？承认山头的存在其目的是要消灭山头要使溶化起来，全党变成一体，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承认他，并且各个部分要去检讨历史，这种检讨都要在一个条件下，就是指导上要正确的，开这种会这种检讨才会有益处，才会有益无害。什么叫指导上正确的？什么叫指导上是不正确的呢？因为现在大家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研究，请大家讨论讨论。

首先就是说从团结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从一百万党员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便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是全党全国人民此外还有什么出发点呢？有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立场没有？没有了，就是这个立场，全党与全国人民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第二就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这个分析也就是批评。我们分析这一个东西加以分解，分解是分成两个东西，那个是正确的，那个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哪丢

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也是分析，分析别人就是批评别人。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难过，现我们中央大家同志提供可以讲话，中央有决议案的，无论是什么时候你们凡是看到工作中间有毛病的地方，你们就讲不成问题，工作中间一定有些毛病的，地方，讲的话是我讲的，做的事是我做的，加以分析，做的正确的那就要承认正确，做的不正确的那就要修改，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讲过的两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把我们见到的工作把中央的工作把我一个人的工作，把你们每一个同志的工作，把你们每一个部分，军队的部分，地方的部分的工作加以分析，不管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正确的要分析，正确的东西，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中证明了是的东西，适合了人民的要求，求得了斗争的胜利，就是说已经在客观事实上证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认，而且要坚持，如果有人对这样的真理，我们就要解释，就要批评，认识了真理就一定要坚持真理，如果不坚持真理怎么办呢？真理要坚持如果真理不坚持把它推到地下打烂了，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了，把中国无产阶级打烂了，也就是把共产党打烂了。所以大真理也好，小真理也好，整个真理也好，部分真理也好，凡是真理都应该坚持，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做错误，那怎么办呢？错误的不是真理，凡是错误的在人民斗争中间不适合的，在斗争中间讲的话不适合那个情况，做的事跌了跤子。写的决议案或者全部不对或者部分不对，假若是不对的，那就说是不对的那就叫错误的，错误的东西应该丢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该丢掉，没有理由还保持起来，有什么理由把它保持呢？人民不要，实际工作中又行不通，话讲错了，事做错了，决议案写错了，如此决议案有十条九条不错，一条

错了，那错的一条就要修改，这叫做修正错误，这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要采取这种态度，要的。一个共产党员不要这样，要这样。在党校学习过的要不要这样，要这样。什么公道呢？这就叫公道，坚持真理，这就是公道，修正错误，这才是公道。但是同志们这样脑子里就要有准备，我看见多少同志因为没有这一条准备，所以就沒有分析。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的不断地分析。这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最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统一，一个统一的东西，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为对和不对的，可以分得开的，如果不承认这一条，同志们这就是不承认辩证法。辩证法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统一。统一的东西可以分开，这样的东西他不承认，他的东西是不能分开的，不能分析的，是整个的，没有这样的精神准备，自己不随时看一看我某一点做错了，比如身上穿的衣服有什么灰尘没有，只看到好的东西，我的衣服没有破，没有破说我破了，不合乎事实，但是有点脏，穿了好几个月，是不是对呢？讲的话合乎事实，灰尘多少总是有的；冬天过去了，把棉衣拆了洗一洗，明年又是好的了，修正错误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多少同志因为没有准备这一条，毫无自动性经常是被动的。人家说你这里有灰尘，「我没有灰尘，那里面有灰尘？」他是被动的，我们要自动性，要经常检查，检查我的衣服我的脸，检查我做的事和所说的话、所写的决议。把我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是真理，什么是错误的改正。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就好办事。我们党校就提倡这一条，党校出去的同志假如你们同意的话，假如你们赞成的话，你们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且到处宣传，对你前后左右的人宣传，到那里就跟那里的人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自己看不到的多得，眼睛看的只有这样远，没有望远镜有也不是

很多，那就要准备请人家看、多准备一点，准备多少？准备一百条，这里有一点灰尘那里有一点沙子，「哎呀！有点痒」还有什么地方有点什么多准备一点，准备一百条，我没有看到经过你们讲，这里讲十条，这里讲十条，这里讲十条，多少条？多少条，四十条。我准备了一百条，你只讲了四十条，我还有六十条准备你讲。事实上没有那么多，那里这样蹿蹿，要有这样的精神，一个说：「没有灰尘。」没有证据，拿镜子来照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则说之，无则不说。现在大家讲话可以讲，讲对了很好，讲出来真理，讲的不对也不要紧，言者无罪。讲的不对，讲出来有什么好处，讲的不对，讲出来了可以受别人的纠正，讲的不对，讲出来也总比不讲出来对，他不讲我就不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乱讲一顿或者其中有几句话讲的不好，受了你的批评，你将了我的军我就谨慎一点，我就纠正错误，好处多得很。

同志们，我们二十四年没有胜利，这是我们的国家太大了，也算是一个缺点，如果我们的国家小一点，假如只有一百万人我们就算胜利了，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名字叫做中国人，落在这个地方那也没有办法，国家太大了就出了一个长期性，这是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没有胜利，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战争没有胜利，总而言之还没有胜利，开党校干什么？办八路军、新四军，一百万——党员，就是要胜利，现在到了这样的时代，有可能胜利，中国的客观条件，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国际条件，国内条件，有胜利可能，就是不要缺乏主观的条件，什么叫主观条件，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的思想有准备没有，要不要胜利？那个不要胜利问我们

刚刚生出来的只有这样高的三岁小孩，他也要胜利，就是没有本领，我们精神上有没有准备。大革命北伐战争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没有精神准备，缺乏准备，思想糊涂、

政策错误，失败了，内战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那时候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我们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因此也没有胜利，这两个时期留下了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人头一个时期留下的人很少了，是以百计算的。是不知还有一二千人？不知道，要调查一下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以前的老同志很少了，虽然很少但是留下了一堆，一小堆，这样一茶壶，这是宝贝，一不是金，二不银，是宝贝，比金银还重要。第二个时期的人便多了，有多少呢我看不过几万人，两万左右不会很多，那共产党有几十万，军队也有几十万，老百姓有上千万，甚至有二、三千万，但是家盖子放炮竹——散了，内战时期，现在还在，还存着的活着的党员，我看看有两万左右，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那里来的，是土里长出来的。这两万人是宝贝，第二个时期包括第一个时期有两万人或者比两万人多一点，三万四万，这一批人是很可贵的。两个时期都包括在内，我们做了这样正确的事，那样不正确的事，叫做跌跤事，人大一点便少跌跤了，你们现在不跌跤了，我现在也不跌跤了，因为我们小时跌了好多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七十而从心所欲了」我在小时，左一个跤子，右一个跤子，印象很深，我的跤经常跌出血来，触在石头上便出了血，别人比我稳重，不容易出血，我说我这个人没有用处，同我一样大的人，跑的飞快脚不出血，我经常碰在石头上，那时候看来是拦羊娃谢了那些石头，使得我现在不跌跤了，少跌跤了，包括各位同志在内，你们现在把

内战时期的历史检讨一下，有些同志检讨大革命，北伐战争，抗战时期这是很好的事情，目的在得出经验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个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坊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这些同志不是他得亲生他下来，就下了命令，要他跌跤子的。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时间，加以分析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加以分析，要从全党出发就是要团结，团结全党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这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辩证法。什么叫辩证法？这就叫辩证法。辩证法的发展，辩证法的运动就是这样的运动。整个分别，再来一个整个，这是辩证法。如果事情搞不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太行山×××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事情没有办好，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不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了。你们各部分开会，内战时期，北伐时期，抗战时期，那部也好，这部分也好，第一个观点出发点就是团结。团结那就一团和气，我们开会喊一声「团结」完了。一句话再一句话，「团结」完了。照辩证法就没有完，要分析，要批评，搞请问题，分清是非轻重。一一党内是非轻重看清楚，很公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的团结加以分析，并且是精密的分析，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那一面，没有看到那个侧面，常常是因为只听了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我们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呢？长一个岂不好吗？这可以研究一下，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我看他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

一面，那个耳朵听那一面，徐特立同志告诉我们说：人的手为什么要这样长，大指头向天，小指头向前面，方向不同，这不是缺点？不是，如果方向同了那就没有社会，没有共产党，没有八路军，没有中国。方向不同为什么没有中国？不但没有中国，并且没有苏联，没有人类。人类在劳动中长这样的指头，因为他要拿工具，他要拿木头，必须手指这样长才可以抓到。「抓一把」就是因为这样，手指头长的方向不同这有道理的。团结加以分析，分析各种矛盾的意见，不对头的意见，听一听每个人的意见加以分析，分析的结果或者全部是对的，只是句把话不好，或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的，一部分不对的。让同志们讲清楚，然后落在一个地方，运动发展到一个地方去了，到什么地点。团结。我们党校是很明显的证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个时期前年整风有很大成绩，这是第一条，也有许多缺点。第二条彭×同志告诉我去年好多了。昨天我给五、六部的同志也谈了，现在采取的方法，我讲的方法，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是从全党出发，把我们这部分、那部分，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工作，加以分析得到的结果，这部分与全党之间也团结了，运动的发展是这样的，如果不谨慎，我们历史上曾有过这样许多的事情。头一个步骤就不是为了团结，头一步走的就不对。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评工作也不很妥当，落的地点，落下去的地方是不团结，我们现在鉴于历史，这些历史很有好处，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觉悟了，盲目性逐渐去掉了，减少了，我们有这样一套，我对于我们准备全中国的胜利，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延安，我们的党校，用日本人的话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脑部，一个头。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研究，会不会达到胜利？会要到达胜利。我们这几年

全党的工作有一个整风是在精神上准备胜利，我们开这个党校，很快我们要开七大是精神上准备胜利，他的性质是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客观条件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就是刚才讲的这些。

山头主义问题上，各位同志要经常注意这一点，你们毕业以后到每个地方要估计各种情况，王震同志打敌人出发时我对他讲：一条叫光明，第二条叫困难，看到光明也是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统一，光明又是困难、是不是打自己的嘴巴！讲光明就讲光明，又讲什么困难？我们党的历史有这样的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时一定要讲困难，三七年三八年抗大学生，那时候不要过五关斩六将，潮水一样源源而来，滔滔不断。我那时不忙，不是这样三年还没有讲过话，对不起得很！那时我可讲的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都忘记了，大家忘记，我也忘记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讲同志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人利于我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之类，中国要独立，三民主义要民主，要解决民主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一些同志在做梦时候或者没有做梦的时候，想的各种东西好象天堂，到了玉皇大帝那里，把延安看作天堂，你这样想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跟他们说了七、八条，你们要

装进去，不然三五个月，你毕业之后，要长叹一声：「早晓得这样的延安，老子不来了。」来了以后有一些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如此等等相当多，那些人大概没有听我讲这点，没有讲通，以后讲通了，文艺座谈会还有别的，在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到延安来的，你怎么看延安，照辩证法的看法，从整个出发，边区是什么地方？边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之一也，之二，晋西北，之三，五台山，之四，太行山，之五，……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华中、华南都是中国革命根据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对不对？当然对，就是这样的定义。在这样的定义下，那就好办，对任何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采取什么态度呢？万岁！就是一个万岁！万岁之万还要准备任何一个根据地还有他的特点缺点，这个边区十年之久还有缺点，全中国胜利到党校搬到上海、北平去了，这里还有缺点，苏联人家叫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多少年？二十五年。有没有工业，三个五年计划红军弱小呢？强大派？相当强大。打仗的时候希特勒都怕得很，他们还出了一个戈尔洛夫，这叫做精神准备。你们出发各地，去到每一个地方要喊万岁，九千岁都不行，为什么要喊万岁，因为那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做的是英雄事业，艰苦奋斗，但是你要准备人多来了不及，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小米大米没有那样多。有缺点、官僚主义，一餐稀饭，一天吃了一餐稀饭就生气，还有那里不晓得你是团长、旅长，他们只晓得你有二只眼睛一个鼻子，是不是「团长同志请坐呀！」没有的，不很尊重。因为不很了解，所以不很尊重，也没有开欢迎大会，坐冷板凳，或者我自己小有缺点，人家说话就来了：「你还批评我呢？」我从前万里长征，八年抗战延安党校，我小有缺

点你就批评了。心里就有那样的东西，叫做气，同志们都要准备，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多少封锁线，敌人袭击，不开欢迎会，开了欢迎会掌声不够，稀稀拉拉的几个巴掌。总而言之，同志们你们要有准备，你们到延安来，也要有准备，华北、华中、华南派干部来要有准备到了延安，人家不晓得你是团长、旅长，人家那里有官僚主义，那里还不是莫斯科，莫斯科还有戈尔洛夫，难道延安便没有了吗？要讲这些丧气话，讲话为什么要讲丧气话不对我讲头一条，讲壮气话，我又没讲专讲丧气话，只讲壮气话，光明、光明、光明，但是事实有缺点，有困难，要告诉同志们：不要只说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丰衣足食专向荒山，要开荒，新式武器佩头一把，总而言之，大概兑不到现钱的支票，不要开，或者可以得到的，也许得不到的，这样不要开支票，对于同志、战士、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能则能，每一个地方都有缺点。我们先估计那里的缺点，那里的困难。因为我们在那里不说清楚，一到这里就批评人家，采取学习的态度，在那里落下来，工作作熟了，那些人了解你了，然后再讲有什么缺点，这样一讲就讲进去了。人家会赞成也会改了，采取这样的态度，采取谦虚的态度，现在各个部分开会，领导的同志、领导的骨干，三个、五个、七个、八个经常商量，要掌握作风，各部分的领导人，指导要恰当，这个东西很有关系，指导恰当，运动就能胜利，会就可以开好，指导不恰当，会就开不好。

三、审查干部：有些同志希望讲一下。上次在这里我已经讲过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没有听到，我再讲一下。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过去有过，但是没有最近这两年，整风之后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取得了

经验，经验就是得到了成绩，也犯了错误，这就是两条经验，一条对于我们的党对于中国人民我们准备胜利。他的成绩是伟大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我们对于我们的党，对于我们革命团体，要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在组织问题上为什么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主义党、资产阶级的政党、美国的大政党、中国的国民党，我们跟他们是有区别的，他们是不是也采取严肃的态度，站在他们的阶级立场上，他们也是采取严肃的态度，但是象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纪律性，任何政党也没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没有，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态度，无产阶级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利的地位站到压迫者的地位，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共产党的纯洁性，这样的派别从有党以来，是模范的党派。仅仅在俄国有。历史上的布尔什维克，执政以后，变成领导苏联的党，联共党史开卷头一条头一行，就讲由小组到联邦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少数几个人稀稀拉拉的形成到联邦，现在是领导核心。小组是小指头，联邦是房子。我们中国也是从小组到联邦，到了没有？还没有，走到了半路要从小组出发，小组到根据地到联邦现在到了根据地，快要到联邦。我们要准备胜利。中国的回、蒙、西藏各族成立共和国政府，再走立联邦。将来的道路是这样，现在还没有。要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共产党的纯洁性，思想行动的统一，政策的一致现在我们怎些。在整风以前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并且相当浓厚，就是说有别的阶级的思想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思想上纯洁不纯洁，不纯洁现在怎样？大有进步，肃清了没有？没有，还要做工作，

所以党校还要开，是不是可以结束，可以解散？ 还必要，还要存在，并且你们出来要采取党校的作风，办党校或是非党校要使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组织上是纯洁的，就是说我们的审查干部在组织上，要使我们的党是纯洁的，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讲起来容易，要具体采取这样的态度经常会忘记，似乎不太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小生产的反映就是自由主义，一群一群的进党，由几万到一百万。同志们，我们的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发展到一百万，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什么办法，那你为什么要发展呢？ 不要紧要发展，我们不怕。这是我们党的一条政策，我们收了来然后整风学习，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里面是敌人派来的特务，特务，叛徒、自首、党派这些问题程度不同，严重性有重的轻的，但是我们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对于这方面怎样？ 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这一点看不出，我和几个同志谈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他举了几十件、几百件也不够，我知道几千件，拿件数算，数量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质量，这个运动的质量，根本是正确的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到处去建设共产党，发展共产党，去整理我们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他纯洁，整风、整理组织、审查干部、审查党员，一百万多党员抗战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要的话就要有一个纪律，思想上纯洁，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的要有一个党，要什么党？

不是社会民主党，不是国民党，要共产党，要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第二条我们要有理论。所以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看到这一个成绩。在去年一年中间发生了一种偏向没有成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同志长了两个耳朵，这个耳朵听一下，那个耳朵听一下，但是缺乏分析因此发生了偏向，这种同志我给他一讲，他很赞成。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我是党校的校长就在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当然是你呀！但是同志们，关于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就是犯了错误。（笑声）你这个话讲的糊涂，乱讲一顿。这样对不起一些同志，一些同志戴错帽子，在座也有这样的人，对不起，一种是搞清楚了是同志或者是叛徒或者自首或者党派，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于这些同志很和气，和他团结。这些同志很好，他自动的讲出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欢迎他，帮助他改正错误，其错误不等，有的重一点有的轻一点，有再轻一点的，有很轻的，我讲的话要算数，发出去的支票要兑现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如果口里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一个不杀，没有杀两个，也没有杀一个，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怎么办？是特务，自首叛徒是党外则团结抗战，是特务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让他团结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算了，过去走错的路现在不再走，走完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

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不敢讲，不然人家早就讲了，因为他害怕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他们这样很好。这是对于这些同志搞错了的同志，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是则是，团结抗战一个不杀。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也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个不是，因为搞错了。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戴错了，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们戴在他的头上，现在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那么你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搞错了吧！我不是，为什么给我戴上这个帽子呢？我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很对。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因为我向你行了礼，你要还我一个礼。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就放不下来，照美国人的规矩，敬礼时一定要还礼，如果不还礼他的手就放不下来。同志们为什么给你戴上帽子，因为把你当特务，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可是其结果是向着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转过凡是戴错帽子的取下来，所有这些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理在你手里，你手里没有空，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理。因为你是共产党员，你还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一点上应该睡觉，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从有共产党以来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赔不是的事，有没有？也有。但是象去年我们这一年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所以我说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要不要胜利，要胜利，

一切都是这样，凡我们对于人民讲的话、决议案，这样政策那样政策，搞错了的就要修正错误。我们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做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方法，就是自我批评。我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山头主义，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就是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中国要胜利我们要采取这种态度。犯

错误本身他有两个侧面，一个是不正确犯了错误，第二就是恰好犯了这个错误之后就会变成经验。以后再审查干部，双方都得到了经验。戴帽子的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谨慎，你吃了亏，凡是被戴帽子的同志你们得了一条经验，你们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他自己吃了这个亏，以后要谨慎一点。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的多。所以我说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对。我们要胜利，成绩以后更要发扬，错误以后要修正。戴帽子的同志你们是牺牲者，所谓牺牲者就是戴错了。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经验对将来运动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严肃态度，谨慎态度。鉴于有问题，我们党组织上不纯洁、思想上不纯洁，就是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鉴于把犯错误戴错帽子，就是需采取谨慎的态度。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严肃态度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就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上次我在这里讲到各部革命团体，讲到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每一方面军里头又有各部分。其中讲的不完全对于四方面军里有几部分我就没有讲，因为我不很熟悉，还有一个十五军团也讲脱了，在我报告以后，有一个同志写信告诉我，这样很好。十五军团从前受过很大的牺

牲，干部都杀光了，剩下的很少。其他各部分我都提到，一方面军各个部分，一军团，三军团，九军团、五军团、六军、七军、十军、一军团内又有各部分，二军团内又有各部分，提的不完全，大部都提到了，革命根据地都提到了，今天我想补充的就是那天没有提到的。

第一个问题，是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了，在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在华北、华中这三个地方工作的同志，拿地方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第二部分就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与本地的关系，军队与本地的关系。因为外来与本地、军队与地方在抗战时期中发生乱子和摩擦的就很多，到处发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本地，认识边区，认识华北，认识华中，要认识本地各地同志，他们的功劳，他们的长处。因为我过去没讲清这点，也不怪那些同志。我以前没有很好分析，在整风后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这中间有外来与本地、军队与地方。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西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感谢他们呢？因为中国革命长期在西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在南方，北方也有参加，但主要的都是南方。南方很光荣。对不对？很对。南方是很光荣。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那样两套。南方有老布尔什

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不很少，我们边区就有好几万，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并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边区，不要不好，不好！还不是不好。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那也应该承认，但是他那个地狭人稠到那里去了，上海在你手里，那儿去了？你那个中央苏区那儿去了？给了蒋介石。只有这个根据地保留下来了。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下一个陕北，陕甘宁边区。这个地方作用非常大，我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经南一转，转到这个地方，然后由这个地方再出去。好象这样的门，我说是中国革命起承转合，门的枢纽能够一开，关，陕北是上面顶天下面立地，起承转合。起是从这个地方起，不自南方起。这里有高、刘、张承南方。转就是从这个地方转。万里长征，脚搞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你走好，到落脚点休息一下。你们党校也在这个地方落脚；你们英勇奋斗，八年抗战，华北、华中、华南，你们还不是落在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永远在这里住一生，生儿子，儿子再讨老婆，再生儿子，你们要走。将来中央走，这个地方是出发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抗战以来，除了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又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又是从这里出发，你们等两天也要从这里出发。在北方华北也有好多年的老党员，象彭×、薄××，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坐在班房里头，只有我们英勇奋斗，人家不艰苦奋斗，他们坐在班房里头和敌人斗争。在北方华北的地方党也有几处暴动。好多暴动是失败了。有很多地方有内战时期的党，许多同志经过三个时期：北伐时期、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在华中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

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点，不但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南方是光荣的，这就等于讲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也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在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现在讲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几万是南方的，九十几万人是北方的，这就应该特别引起外来同志的注意：一百万中九十几万是本地人，只有几万是外来人，这几万同志对于这九十几万同志应不应该尊重、感激、看重？完全应该。这九十几万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训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他们有经验，经过国内战争。北方也有一部分国内战争，大部分还是在南方，他们教会了华北的人民、华中的人民。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在战争时期大概的数量有十万，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在座的还有许多同志他们领导的。因为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很多。根据去年就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是两条。有问题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底下，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在南方同志里头混进了一些坏人进来了，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因此我们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了，究竟有多少，数目现在还不能算，等将来全国胜利，由小组到联帮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做，十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是农民同志，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聋子放炮竹

——散了，到处散了一盘散沙，现在大后方就是这样的政策，就是从前用来讥笑中国人的话——一盘散沙就可留下来，就可以不被破获，或者少被破获。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他的特务。厉害是厉害，第一条厉害，第二条官僚主义，我们不承认厉害不对，合搞阴谋那样厉害三头六臂，三头也没有，只有一个头，蒋介石也还是一个头两只手，和我差不多。我们共产党的官僚主义比较少一点，国民党还要多一点。我们自己要搞清楚，特务厉害，还要加上官僚主义。究竟多少有问题的，多少没有问题的，现在谁也不能答复，要由小组到联帮才能答复。这次王×、戴××出去建立根据地，就采取严肃的态度、谨慎的态度。大体上这样两条，一条承认那个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没有问题，是纯洁的。一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大部分是纯洁的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做出来，应该讲南方工作同志的成绩。他们有没有缺点？有缺点，他们要去检查；总的来说，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有三方面的战略：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这是一个问题。

最后白区工作问题，这一条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是有问题的，在某些时候应该说是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百分之百，现在看没有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的工作好好的做，不要再有那样的东西。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做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等于在南方根据地失掉，在领导上犯了毛病，根据地失掉了，并不是说红

军战士、干部、地方同志、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一样的。白区工作的同志没有坐班房，活着的，没有坐班房死了的，坐班房死了的，这一部分人他们替党替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为了斗争，他们拿着命，将因为这样坐了班房，少数侥幸外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的成绩。这是关于白区工作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因为上次没有讲，今天补充一下。今天我想讲的问题就是这样。很对不起，同志们坐了很久，讲完了。（鼓掌）

○资料选编 一九六七

苏联红军纪念日致斯大林元帅贺电

一九四五·二·二二

斯大林元帅：

红军在你的领导下所获得的伟大胜利，鼓舞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欣逢红军二十七周年纪念日，谨致祝贺之忱！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解放日报 一九四五·二·二三

唁电 A·托尔斯泰之丧

一九四五·三·六

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吉洪诺夫同志：

惊闻苏联著名作家，亚列克赛·尼科拉也□□·托尔斯泰□□□□，谨致哀唁

毛泽东

三月六日

○解放日报

一九四五·三·八

〈毛主席唁电 A·托尔斯泰之丧〉

致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复电

一九四五·三·三一

当天，我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致电报喜，并报告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三月三十一日，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电。电文说：

你们占领平江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个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间的根据地（包括崇阳、通城、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长沙、湘潭），然后继续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忆南征（修订本） 王首道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三

哀悼罗斯福总统之丧唁电杜鲁门总统

一九四五·四·一三

（新华社延安十三日电）美总统罗斯福噩耗传来后，延安各界同声哀悼。毛主席、朱总司令除致电杜鲁门总统（原电见后）及函美军观察组悼唁外，并派叶剑英、杨尚昆同志代表赴美军观察组致唁。（后略）

华盛顿杜鲁门总统：

罗斯福总统不幸逝世，我们谨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族表示吾人之深切吊唁。举世均将深痛此种损失。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 延安

○解放日报 一九四五·四·一四 〈举世哀悼罗斯福总统之丧 毛主席、朱总司令驰电吊唁〉

「七大」工作方针

一九四五·四·二一

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斗争，不讲很远的历史，单讲比较近一点的历史，也有一百多年了。从一八四〇年和英国人打仗的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五年，已经是一百零五年了。这一百多年中间，有很多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当着资产阶级刚开始产生，或者稍微长大一点，或者后头更长大一点的时候，当着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先锋队的時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还不高。但是资产阶级有各种优势，它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经验上，都占

优势，它有政党，有口号，有自己奋斗的目标。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它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只是近二十几年，无产阶级才有了自己的政党、口号和奋斗目标。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人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起来一次，被打下去，再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这样的历史差不多有八十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历史，据说有五百万年。这五百万年之中，一段是野蛮史，一段是文明史。文明史只有五千年或者稍多一点。我们中国的历史算长得很长，但也只有四千多年至五千年。从黄帝纪元算起到辛亥革命四千六百零九年，再加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四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四十三年。其实所谓黄帝那个时代，还不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从奴隶社会算起，在中国据现有的可靠资料，应从商、周算起。文明社会五千年来，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资本家撞了资本家，市场少了，有的抢到的地方广一些，有的抢到的地方狭一些，因此打起来。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发生的。在座的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就会知道，记得此事。这次战争，刚才讲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到那种程度，就要出这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这次战争是破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斗争，是损害人类利益的战争，是抢夺市场的战争，这是它的消极方面。但是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方

面，就是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共产党，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我们中国就是一个。跟着世界大战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来接着有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但是这些都被打垮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分裂的，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觉悟也不够。胜利的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俄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胜利。许多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建立，印度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建立。东方几个大国如此，其他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共产党，大体上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九一九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五四运动，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民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所以我说，同志们，你们很幸福。我们那时候长得很大，还不知道天多少高，地多少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知道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一九二二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得，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只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根据地到全国，现在还是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五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俄国共产党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五年也是大不相同的二十五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二十五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

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但中间被人家拦腰一枪打在地上，爬将起来又和他打，叫做土地革命。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主要是北伐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是国内战争，三七年至现在是八年抗日战争。七年加十年，再加上八年等于二十五年。现在的同志经历三个时期的不多，经历两个时期的那就很多。这就是我们全党讲。在座的代表中，这个统计还没有做，究竟是三朝元老多，还是两朝元老多，还是一朝的多，现在还不知道。这二十五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象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象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三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

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一九二五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

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三〇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我们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

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修改发表。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需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象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四翻四覆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的。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联共党史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一九一七年就胜利了，三八年才由中央出版联共党史，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可见此事不易。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五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譬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这样。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

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我再讲一讲治病救人。治病救人说，为了救人而去治病。人本来是好人，但病菌进去了，得了病，就请医生看一看，吃点药，治好了。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也不行。无论偏向那一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象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过去常说，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象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但是，官长不能打士兵，这就是说，干部与党员要有正确的关系。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

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

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的，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象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懂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

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他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从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的来说，我们党二十五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中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五·四

讲三个问题：（1）形势与路线；（2）关于政策方面的问题；（3）关于党的几个问题。

一、形势与路线

七大应决定一条基本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前者是组织队伍，后者是目的，即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条路线不是我们党内历来就有的吗？是的，历来就有的。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性质就从旧民主主义变成了新民主主义。从大革命到内战到抗战，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的纲领就是这一条。若干年来，全党全国人民就是为着这一纲领奋斗并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

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总而言之，当前的一切革命任务，就是这种性质的。这里边有队伍，有敌人，有指挥官（指导者）。队伍即人民大众，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即无产阶级。说我们的纲领很多，不好记，但是并不怎么复杂，就是这么几个字，应该记得住。可是这样几个字，这条纲领，常常被同志们忘记，反帝记得牢一些，反封建常易忘记。何以忘记了呢？因为人民大众里有农民，也有地主。所谓人民大众，主要部分是农民。有一个时期却忘记过农民，一九二七年就忘记过。当着农民伸出手来要东西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却忘记农民。抗战初期也犯过类似的错误。靠什么打倒日本来建立新中国？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是其他民主分子。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一切，没有民主革命，也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忘记了农民，你就是做了一百万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地方。因为没有力量，仅仅闹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行！没有力量！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没有农民就没有一切。没有农民，谁给你饭吃？谁给你当兵？没有吃，没有兵，就没有一切。

无产阶级有一部分组成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觉悟部队。当然也有别部分的人参加，如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地主等等。但这是他们的出身。出身和进党不同，进了党就成了无产阶级了。党要革命，就要组织队伍，就要靠农民。组织了队伍，就要有一个指挥官，在中国，要么就是无产阶级，要么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的体现者，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国的社会是

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小，但两头都强；中间大，但政治上都弱。两头强，即国共两党，自由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进步的不得了，与共产党差不多，他们有他们独立的纲领和行动，现在即是民主同盟（其中也有小资产阶级）主席张澜发表的声明，即他们独立的政见。左舜生的一次声明亦然，他们也赞成联合政府，他们也在联合政府问题上，和我们统一起来，所以我们目前还要团结他们。但他们有独立的主张，他们是左右开弓，他们一方面不满意国民党一党专政，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他们站在国共两党之间。这就规定了他们自己的性质，所谓中间派。

大革命时期我们犯过错误，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后一时期，就很少马克思主义或不要马克思主义了。大革命前我们组织了一千多万农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起来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说那时已有马克思主义了。一九二七年，以陈独秀为首的党，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忘记了无产阶级领导，那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有时又不要农民，农民伸出手来要东西，他泼给农民一盆冷水。共产党受了地主影响，向农民泼冷水，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帝国主义是要到中国来揩油，而中国五分之四的人民是农民，就是说中国五个人中四个是农民。比如用五个指头打敌人说不得了，砍掉四个，剩下一个小指头（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这样就使无产阶级孤立起来，无产阶级总司令没有了农民，就变成「空军司令」了。农民不来，小资产阶级也不来，开小差了，这不能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是看你大不大。小资产阶级有时很凶，老子天下第一，有时他又屁滚尿流。当你剩下一个小指头时，你向他说，

同志来不来？ 他不来，他说有事，家里老婆生了病。这不能怪小资产阶级，只怪我们总司令手下没有兵，没有力量。只要我们的总司令招兵买马，聚草囤粮，我们有了四个指头即五分之四的农民，及其它阶级，有力量了，那他就来了。你叫他，他本有事，他会说没有了，老婆也不生病了。从前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即要领导总有个被领导的吧。大革命后期，农民不来，小资产阶级也不来了，于是地主集中力量一打，朋友也打来了，狠命的一巴掌，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以后爬将起来，比较清醒了，又搞土地革命。搞土地革命对呀，但又来了个急性病。急性病也是不要农民，他们只要工人，急于打大城市，农民是附带的。住在农村不懂得农民，走马不观花，下马观花叫调查研究。走了两万五千里，没有看见花（农民）。什么叫中农、富农？ 对不起，不知道。小资产阶级，其它民主分子也不要，于是又成了「空军司令」。我们党曾经两次大了又小，第一次五万党员，后来剩下一万多；第二次三十万，后来剩下两万五千；现在又立起来了，可再小不得了，如象女人脚，现在是放的时候了，不要再包小了。抗战以前我们有准备，叫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中央历来都是说，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敌人。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一百〇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个说过不要人民战争。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可以打败敌人的战争。从来没有说过不要人民战争，可以打败敌人。（有各种各样的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军事斗争）但是很多同志，由于马列主义不很多，可以随时忘记农民，不要人民斗争。这样的人，即使发表宣言，说他是马列主义者，那也是他自封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以为依靠国民党，可以打败日本，这就表明没有马克思主

义了。党内这样的人还不少。一九三七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八月洛川会议，十一月活动分子会议，都批准了中央的政治路线，曾经肯定了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中央不相信人民能够打败日本，能解放中国，至少也是暂时失掉了马克思主义。相信，即不会失掉马克思主义。暂时失掉马克思主义还可以「招魂」，把这「魂」（马列主义）招回来。不相信没有广大人民能够打败日本，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将无产阶级降低到资产阶级，而是将资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纲领，还是要把无产阶级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纲领。这个问题就是说无产阶级吸引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吸引无产阶级呢？这种说法被人家驳斥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就是争领导权，为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总以为他对。我们应向广大农民宣传，要农民、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打败日本，才能胜利。只有这样说才是共产党的宣传家。这样两句话并不复杂，要告诉人民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国民党，改造他的军队，改造他的政府，不改造不行。依靠中国人民、民主分子和国际力量，我们估计国民党能改造。结果国民党来改造我们，在估计上犯了一个错误。但也有好处，未赔钱，我们要他改造，天天这样讲，老百姓都知道国民党的脸脏得很，知道了他应该洗脸。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应该说有两种可能：能改造，不能改造。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有了这些条件，就可能改造。我们共产党要蒋介石改造、洗脸，他说不洗，说「我干净得很呀！漂亮得很呀！」老百姓说他应该洗洗呀！西安开大会，会上喊「蒋介石万岁！」老百姓喊「赶快纳粮完税！」老百姓知道了要他洗

脸，这就是胜利。一直到今天，还是请他洗脸，不是要割他头的政策，就是请修改他的错误的政策。年纪越老的人越不愿意洗脸，洗的可能性小，稍微摸一下子装装样子有可能，甚至连摸都不摸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将中国拖向黑暗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集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六中全会上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诸国民党漂亮得很，提出拥护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口号，对国民党时时帮助，事事帮助，处处帮助。六中全会对这些有了纠正。开始以为国民党漂亮得很，以后出来了一个「限制异党办法」，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露出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我们的同志觉悟起来了。四一年两次反共高潮，人家要求解散共产党，这样大家对国民党的幻想，大体肃清了。在广大同志的头脑中，展开了一幅新图画，这才了解打日本不是靠国民党，而是靠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说明要去掉一种错误思想，光讲不行，必须经过经验才行。我们请了两个义务教员，日本法西斯和委员长，不要薪水，他们教好了我们许多同志。六中全会以后，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地主坚决执行了我们的领导权，于是发展我们的党、军队、政权。如解放区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扫荡）。去年以来转入攻势，进攻为主，防御为辅，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和无数次的进攻（磨擦）。于是国民党的影响低落，势力缩小。委员长也请了一个教员，冈村宁次，这个教员给泼了许多冷水。但是还不要把国民党的影响和势力看轻了，现在国民党在群众中还是有影响的，要想去掉它，还需要多少年。国民党已有五十年的历史，五十年的影响。我们才二十五年，我们的影响不来，他的影响不会走。所以说他的影响还只是低落，而不是没有了。他的势力还大，还有二万万人口，一百五十万军队，他有国际地位，我

们没有，所以说他的势力还只是缩小，而不是没有了。但是由于抗战时期，我们执行一条放手发动群众的正确路线，于是我们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广大人民群众都盼望着我们，而把国民党放在影响低落、势力缩小的地位上去了。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是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的要求。这条路线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路线。现在比以前更明确了，不比以前那样了。直到三次反共高潮，还有些同志不相信这一条，是否这种思想现在已经绝迹了呢？党内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对这一条正确的路线，并不是都完全了解了，并不是每一个同志都是马克思主义万岁。我们从一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的都有，也有万岁的，但不多。他们不相信这条路线，放弃领导权，放弃独立自主，放弃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战争是暂时的局部的自卫的立场，即有理，有利，有节，这是有利于团结的。为什么国民党不敢同我们决裂呢？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去人，蒋说不行，我们说去，蒋说不行，结果还是去了。我们的代表已经到了华盛顿。权力是争来的，不是人家送来的。有人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哲学（邓宝珊），他说对了。我说他们也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斗争哲学还在他们后面。离了斗争讲团结或斗争的不恰当，没有劲，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个章乃器，他对恩来同志讲：他犯过了错误。我在一个演说中批评过章乃器主义的「多建设，少号召」。不要蒋洗险，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理论被我们战胜了，他那个万岁不大喊了，因为万岁不要他。他有点象汉贾谊，才子不遇。但他也不会一下子转过来喊共产党万岁。这种自由资产阶级还会用其它软弱性来影响共产党，而且有目的地向

我们送些软香、林黛玉的香来卖。玫瑰花好得很就是有些刺。我们的解放日报每天放玫瑰香。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麻烦还在后面。革命就是麻烦，怕麻烦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的意志变得更加加强了，不至于被他们淹没了。

总结以上问题：

(1) 农民是怎样？二十五年来尤其是八年来农民非常欢迎我们的政策。但当作党的领导思想来说，我们要同农民分清界限，不要与农民混同。农民出身的同志不易分清这个问题。出身和入党不同，这是两件事情。出身是农民，入党就是党员。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与农民分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将来要把党外人士也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可是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2) 小资产阶级怎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管党外党内的）有两重性，革命性和动摇性。动摇性能以教育方法纠正的，整风就是证据。如文艺座谈的方法，党提出方针教育他们（不是命令他们），是能改造的。党外亦然。我们有广大解放区，有强大力量，对他们作适当的宣传教育，是可以影响稳定他们的。

(3) 自由资产阶级：目前是我们的同盟军，但他们有更大的动摇性。他们要民主，这是与我们共同的，所以是我们的同盟军。动摇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可以使他们中立，甚至可以使他们跟我们走。

(4) 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代表，是反动派。他们在抗战中和我

们争领导权，是抗日阵营中一个最凶恶的敌人。他们要把中国拖向黑暗的老样子的中国，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他们想把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括括油水。

(5) 外国：苏联无问题，对其他外国，也是又联合又斗争，如果出了斯可比那不行。外国还有强大的反动势力，报告中提到三个国家团结是统治一切的，主要的。报告中对黑暗的一面说的少，但要对他们警惕，他们给委员长撑腰，有时装作天官赐福的样子。

以上叫做「形势与路线」。

二、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

(1) 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两部分是否是这一次划分的？不是的，从前也划分过，不过没有象这一次这样划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小册子，写了一般纲领，未写具体纲领。如六大的十大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各根据地发布的施政纲领，都是性质相同、条文小异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如：婚姻法、土地政策附件等等，都是具体纲领。新民主主义就是总纲领。有纲有目，具体纲领就是「目」。

(2) 关于孙中山。引了他许多好话，把他的好处抓紧，死也不放，我们死了还要我们的儿子去抓。但也有区别，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比孙中山进步得多，完备得多。我们党内有很大一部分党员，不太高兴孙中山，不知为什么原因，这还是表现了不够觉悟，还保持了内战时期的作风。内战时期国民党拿孙中

山打我们，不要他还可以原谅。同时，那时我们力量还小，不要他也没有关系。现在与内战时期的情形不同了，现在我们的党大了，力量也大了，要他有好处。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要他的好处越多。苏联以前不要宗教，现在也要它了。力量大了也没有关系，苏联从前也没有积极消灭宗教。我们应有清醒的头脑，利用孙中山这个旗帜。我们力量越大，利用了越有好处。

(3) 关于资本主义。我在报告中有所发挥，就是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这个东西。这有什么好呢？我们肯定的是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曾经有个同志说：「应提出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当时考虑了一下，一般纲领中引用孙中山的话，具体纲领中不提为好。一般纲领中说是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存在，实际上就是说操纵国计民生的要没收。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之外，肯定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现在没收就是没收蒋、宋、孔、陈的财产。你说没有讲也讲了，还是孙中山讲的。现在的一般资产阶级还不是斗争的对象。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特殊资产阶级，即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产阶级。欧洲对这些都是要没收的。对汉奸的财产是要没收的。党内有民粹主义思想存在，即是直接从封建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不经过资本主义。俄国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后来都变成反革命。布尔什维克与此相反，肯定俄国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有利。十月革命后，中小资产阶级、富农，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经济仍允许其存在。我们的同志急得很，看见人家搞社会主义，我们也想搞。人家十月革命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才消灭富农。在那以前，当时粮食主要是从富农那里供给。

(4) 共产主义。在报告中提到了，但未强调。共产主义纲领，即没收私有财产，消灭阶级。这样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即教育党员。许多党员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农民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他，就叫共产。此处不提为好。

有人劝我们改名字，他们说：「先生之志则大，先生之著则不可」。许多人说，就是这个名字不好，如果改了名字，我愿意参加。美国也劝我们改名字。

改个什么名字？ 国民党吧？ 保守党吧？ 福尔曼写了一书叫「红色的中国」，说红星照耀中国。不管你改成什么名字，他都叫你红党。凡是红色的都要挂在我们账上。老百姓怕儿子养不成，起个名字叫狗儿，猫儿，我们是否也如此呢？ 一个记者爱金先生说我们是「温和的民主集中制」。他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还嫌我们温和呢！ 这个名字很好，这个名字不要改。老百姓很爱他，江西老百姓叫我们为「共伞党」也好。

(5) 对国民党有尖锐的批评，但是客观的，没有超过实际。他有一点好处也挂在他的账上，但可惜他的好事太少了。尖锐的批评留有余地，还可合作，还可谈判，并无打倒「委员长」字样，连「委员长」字样也没有。死人只提到孙中山，罗斯福，活的少提为妙。反动的只提到希特勒，革命的提到斯大林。余地就可少犯错误。若是打倒蒋介石就会犯错误。他们几次挑拨我们去打倒国民党，我们不打它，我们还是说：「你洗洗脸，我们结婚，爱情重得很」。但自卫立场必须保持，他若向我进攻必须反攻，必须回答其进攻。文的武的，特别是武的，必须回答，要坚决，干脆，彻底，全部，消灭之。要消灭得

干干净净。我对联络参谋说：我们的方针是：「不以天下先」（不打第一枪——老子），其次是「退避三舍」（左传），第三是「礼记」所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是这一方针，现在仍是这一方针，只要我手里还有一枝枪，就要打到底。

你放了我九十九枪，好的，呱呱叫，但我也要打。从前有个愚公移山的故事……，不移掉他不相信。世界上反动派不革掉他是不行的。我们这一辈子打不完，交给我们的儿子去打，不把世界上的反革命打平不为止。打。但是自卫立场，这叫有理。有些同志劲儿来了，就忘记了这一条。不对，暂时的、局部的自卫方针，违背这一方针，要犯错误。准备国民党搞麻烦，还长得很！

（6）争取旧军队，利用旧军官，改造旧军队。这件事要在全党进行宣传，不能简单对待，要有政策。改造不了的只是那些反动派，相当广大的旧军官是改造得了的。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中，许多旧军官是找饭吃的，为了升官发财。我们力量大了，就不怕他造反。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争取九百万旧军队，做的时候要严肃性，警觉性。有了这种「性」，暗藏特务、公开造反都不必怕。造反吗？他们过去不是造反了多少年？要走吗？开欢送会，送路费。他原先没有来，现在走了还不是一样？我们是毫无损失，损失了些小米，法币，但政治上的胜利却是很大的。走了何时想来再来，对进步的要争取，要适当帮助。「适当」就是不多不少，从前我们有两个错误，一个全缴枪，一个全帮助，无原则帮倒忙。要作两条路线的斗争，

反左又反右。对于进步的、与人民有联系的旧军队、旧军官要适当的帮助，加以改造，加以教育。

(7) 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杀纵红队、山西新军，内部外部都是统一战线，联盟的。内战时期是否党与非党联盟呢？是的。我们也叫过党军。所谓党军是说党的领导，不是说不与党外人士合作。我们军里边党员只占少数（三分之一），多数是党外人士（农民、知识分子）。现在我们的军队，就是人民大众的，为人民大众所有又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又有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若有人问：「贵军何种性质？」简单的回答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军队」。不要天天讲：「领导你，领导你」。使人不喜欢。怎样领导是靠政策、行动、工作来领导，只要人家跟着我们走，你不用说也就是领导了。领导权要掌握，但不是天天象念经一样的念呀，就能掌握领导权。现在山东有三支伪军，原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叫搞通思想，他们很高兴，变成了八路军。这就是军外合作。军内合作，有饭大家吃，有敌大家打，不发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反共反革命者不行，只要赞成民主者，愿意来者，赞成我们的主张者，加入我们的军队，我们都欢迎。姜太公钓鱼，愿来者上钩，立场很清楚。

(8) 扩大解放区。一切可能攻克的地方均进攻。还要防敌人之进攻。原来是防御的，抗战初我们是进攻的防御。四一年四二年我们缩小，四二年四三年我们又发展了。所以现在规定两条：第一进攻，第二防御。扩大发展，集中小的武工队，大的六个团。进攻的方针，因为情况变化了，敌人现在是在自顾不暇，而我们的力量大起来了，我们集中力量去进攻他，他就很少有力量来进攻我们了。这是不是冒险

主义？不是的，我们讲向「可能」攻克的地方进攻，又讲巩固，敌不是冒险。

再有一年的攻势，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到以正规战为主。

抗战开始时，敌人是日本，友军是以前的敌人——国民党，我们是小姆指，只有三万人（三六年），三七年出发时也不多。这时的任务是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长大起来，大家都赞成。如何长法，麻雀战、游击战。六中全会提了十八条理由，凡有麻雀吃的地方，都去，满天飞。讲十八条理由有利，你少一条不行呀！应该麻雀战，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我们无办法，他们挑拨我们打大仗，民族英雄呀！麻雀战机会主义吧！谁也不愿意当机会主义，而愿当民族英雄。麻雀战是有点机会主义。现在集中到九十一万不是麻雀吧！永远麻雀，麻雀万岁！不能！我们这个麻雀长成了野鸡，书上有个大飞鸟，从北洋飞到南洋，一个翅膀可以横扫全中国，我们要把小麻雀变成大麻雀。

抗战开始，你搞点线，我搞面，还要就食，分散才能就食，要活下去就要分散。内战时期，搞了一个正规化，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不生产，吃了几年，吃光了向后转，向后转，万里长征，英雄豪杰。

现在要准备由游击战逐渐变到正规战，得到新武器，就可无敌于天下。报告中讲到进攻为主，防御为辅。马克思主义多了不好，一种是香马克思主义，一种是臭马克思主义，一种是死马克思主义，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也就得了。现在要防止骄傲。我们九十一万人了，日本人滚蛋啊！打，一要打赢，二要有饭吃。打不赢，「聋子放爆竹」，散了。

现在应该集中兵力，向敌人薄弱地方进攻，集中一千人，消灭敌人一百人。逐渐转化为正规战，但是无论什么情况都集中。

(9) 还有一个乡村与城市问题。乡村路线到一定时期转变到城市路线。从前城市乡村问题争执得很厉害，叫做政治路线，下马看花，调查研究，在乡村走一万里。走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过要看情形，马克思主义是当着要到农村去时，就去农村；当着要去城市时就去城市。现在准备夺取城市，掌握城市交通、工厂。有人说我们是土皇帝，有些象，永远土皇帝下去不好，……，现在要准备把重心转到城市去。以城市为重心，不是一切都到城市去，现在把城市工作提到与根据地同等重要的地位。

要慢慢讲通到城市工作的道理，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学梁山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至于转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从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要好好准备，要准备发生意见分歧。一定要发生一些分歧，要准备对付将来可能发生的分歧，高级干部头脑要清醒，要准备应付分歧意见。有了准备，分歧可能减少。

(10) 军队与根据地。根据地是战略出发地，一万人人口太少了。搞到两万以上就好了，局势就变化了，九十万军队是分散的，现在我们没有地方可以集中十万人，集中一块就没有吃的。且没有新式武器，打城市不行，……

现在我们是分散的，现在条件是就地筹粮，将来的条件是武器加……，全中国在我们手中时需要三百万到五百万军队，自己生产，老百姓负担不多少。现在要扩大军队，但要在可能条件下，所谓可能条

件就是老百姓负担问题。还有枪的问题，没有枪，徒手不好。

(11) 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大会建议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重要情事，所谓会议就是说不是普选的。而是军队、政府、群众团体等等派代表开会，普选恐须在战后才了。召集后要发生作决议，产生一个领导机关。要比较快的召开，党外人士要占多数。准备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开会时要打电报给委员长，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向他请过多少次，蒋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他说是分赃会议，我们说孙中山召集过国民会议，他说：「你们把我当北洋军阀，你们就是总理」，那简直是个流氓。

不说是政府但要起政府的作用。这个联合会出来时，一定要骂我们称王称霸，称政府之王，政府之霸，看那个王八蛋敢反对。

三、关于党的几个问题

(1) 个性、党性问题：

整风时曾发生这个问题，新闻记者说我们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文件上强调党性，这样说是不对的。报告中说：「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使他们智慧和身体都不能发展。鲁迅的骨头硬，半殖民地国家，象鲁迅的骨头是可贵的，有些人被压迫着就变成外国的奴隶。上海

公园门口上挂的牌子上写：「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去」。外国民族压迫中国不行的，法西斯压迫人民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反对这些压迫，压迫人民不行的，这就是解放了个性。

党则不同，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统一的部队，它是为着一个目标而奋斗前进的，没有这种统一是不行的，会被敌人所消灭。没有民主集中制不行，革命的民主与旧民主不同，有更大的民主。党员是人民中之自觉地承认党纲党章、自愿牺牲一切的（有些人不加入党，不受拘束），党员要服从党纲、党章，决议案，牺牲自己为人民是自愿的。

我们的党比较过去要统一一些、是更加严格、更加统一的军队，我们只是说的比较统一，没有讲已经完全统一。有人说，放下来没有问题，提起来问题很多，这话很对。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有两万，现在比抗战初期扩大了几十倍，一百多万党员，意见很分歧，将来党还有扩大，意见还要分歧。因此，首先一件事，就是整理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象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一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野百合花」，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便好好整风。那些延安的文化人想找「韩荆州」，找些什么人呢？找抹口红打胭脂的人，找到「前线」中的「客里空」作「韩荆州」。我们则说，吴满有、赵占奎、张治国是「韩荆州」。我们说的「韩荆州」就是工农兵，所以没有整风不能前进。

整风解决了精神问题，生产解决了物质问题，现在可好了。但仍有问题，即党还不是完全的统一。没有民主，没有自我批评，不能达到更高的团结，问题解决了又发生了，发生了又解决，解决了又发展，

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不把分歧的意见统一起来，许多不平均的事情不解决，说不上什么完全的统一。

所以中央以及各个领导机关，要听人家的话，若不听人家的，好比不开窗子，怪空气不进来，是谁的错误？我们开的是政治工厂，窗子一开，空气就会源源而来，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道理有些人知道了，就是不肯兑现。一句话，党性——普遍性，个性——差别性。普遍性是建筑在差别性之上，没有党性哪有党？没有差别性哪有普遍性？各种工作人员（工农兵，苏区，白区……）都有差别性。了解马克思主义程度不同，一个人幼年与老年也不同，抹杀这些不同，统一在一个轨道上，不行，要发展个人的长处，发展个性。太阳是有轨道的，但八大行星各有不同，不知有人否，没有调查研究不知道。天上的星也有闹独立性的。晚上常看到一个星脱落而去。抹杀差别性就没有统一性。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党内有少部分干部常感觉不平，不公道，我们对这些同志特别注意。

1. 理论工作同志：整风讲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整风中对知识分子有批评，好象他们就不那样吃得开。没有理论就没有行动。因此，党内应当学习理论。党内理论水平不高，几年来，有些进步，但要说明一个运动的各个侧面，内部联系，总结起来提高到理论，还是较差的。什么叫理论？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有系统的知识，把斗争经验系统化，而成为理论。

翻译工作的同志不要以为翻译工作不好，还要大大翻译，党内能看原本书的人很少，马、恩、列、

斯，把英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东西翻译出来供同志们看，很好。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要把他们看作有贡献的人，要尊重他们。

2. 知识分子：一个阶级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有高级知识分子，有普通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其他的知识分子。三国演义各国都有知识分子，穿八卦衣的都是。水浒传中也有。任何一个阶级都有为那一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希腊有奴隶的经人苏格拉底。中国则有周公，以后有刘伯温等等。无产阶级要翻身，没有知识分子不行。因为整风、审干，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些。现在要弄平一些，欢迎他们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军队，经济各部门都要有知识分子。

3. 大后方渝陷区来的同志，以为根据地吃不开。他们吃得开。审干审了他们一下，找他们麻烦，是西安、上海来的，对他们看了又看。现在弄清楚了，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摘下来，恭恭敬敬的敬一个礼。他们对根据地的作风看不惯，慢慢就会习惯了。

4. 关于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报告上写了要如同兄弟姐妹一样的亲爱他们，初来陕北有些人讲闲话，说陕北人能创造苏区不能带红军。我说讲得好，中华华北是否有此情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条很重要，历史上有许多纠纷都是从这里来的，王震、戴季英出发时，我们都谈过这些问题，现在要大讲。

我看人是不完全的，共产党也是不完全的，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们不能说不是布尔什维克。多走了两万五千里，有些同志，背了一个包袱，变成了驼背。人家没走两万五千里，可是有根据

地，你走了两万五千里，但没有根据地。若是那些同志要我赔中央苏区的根据地我还赔不起。越搞包袱越大，青年同志也有包袱，青年人眼明手快，轻视老同志，把老同志叫做庸俗老朽，老同志把青年人叫做年幼无知，老幼都不应这样讲。种地不如吴满有，做工不如赵占奎，当兵不如张治国，每到一地方要用共产主义精神办事。要与该地人民打成一片，要认清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凡是用我们的手放上的石头，包袱，要取下来，自己的手放上去，要用自己的手取下来，是人家放的帮助人家取消，使每个同志愉快起来，这样党就团结了，也能团结全党了。

每到一地方，一定要看人家根据地军队工作，都是好的。到一地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要当钦差大臣，要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要看不起人家，去掉盲目性，来个自觉性，要尊重每个地方同志，与一切地方同志搞好，与地方人民队伍搞好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

5. 经济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因为过去对这些工作宣传解释不够，有人告诉我，总务工作不受欢迎，总务处长见人不说他是作总务工作，而说是做「一般工作」吃不开。现在要让他们吃得开，他们大有杂牌军之感。都是「中央军」，哪有「杂牌军」。

6. 民运工作干部，其中有工、农、青、妇，大城市打开之后，广大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都要来的，我们是工人政党，历史上做工人运动的同志不多，留下来的也不多了，要珍爱他们。青年重要。没有妇女也不行。

7. 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大革命内战时期的干部，富有经验，领导有方，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对！

但前面两个时期的干部至多还有两万。抗战后有一百十九万。老干部包袱大了，又顾漂亮得很。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没有我们不行。但眼睛要看到一百多万，不要看不起他们，不要叫新干部，要说是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要让他们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想怎样说就怎样说，使他们觉得容易与我们接近，不要使他们觉着不易接近。

8. 党外干部，是一个大问题，全国就是发展到四百五十万党员也不过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每个党员的任务就是要去团结那百分之九十九，这就组成一个军队。如果不会团结，就不是一个好党员。为什么要共产党员呢？难道是为世界上房子太多，小米太多？其所以要共产党员，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好打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不是这样，革命就不能胜利。有些人则专门革财政厅之命。只有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革命才能胜利，一个党员是毫无办法的。只有共产党员是不会成功的，党外干部，组织部门各地要有调查研究，开座谈会等等，了解他们，培养他们的领袖和干部。

(3) 说真话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不偷，不装，不吹」。

什么叫偷，我看见过这样的事，写一本小册子，抄整风文件，改几个字，叫做「抄袭」。应该那个同志讲的，就是那个同志讲的。

什么叫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也」[▽]，懂得就懂，不懂得就不懂得。

偷与装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要他偷、装。猪鼻子插葱装象。

我们党要允许一种状态，不懂，懂得少，不要紧。我们提倡读五本书「联共党史」、「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从空想到科学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

第三不要吹，要「实报实销」，对上级作报告，不要夸大，情报要真实，缺点要向人家公开，扫微生物。人家骂你官僚主义，罪有应得，牛也有官僚主义，牛奶都有喝的权力，但是要人家去挤。鲁迅也讲过这话，从也有人说过，写文章不如挑大粪。……矛盾统一，天下太平，那么我们的这个作风就确实老实实在。

党是伟大的，是二十五年的党，我们准备胜利，我们去迎接胜利，为争取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集补卷 第7卷 [1941・2～1945・4]

1985年1月26日 初版発行 ©

監修者 竹内 実
編集者 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
・代表 藤本幸三 市川宏
発行者 中村公省

発行所 株式会社 蒼蒼社
東京都千代田区猿樂町1-2-6
振替・東京4-63055 電話 (03) 291-0068

写植／長城社 印刷・製本／中央精版印刷
ISBN4-915441-17-2

